



## 《记忆》138期

## 目 录

### 【专 稿】

范世涛 八一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

### 【要有光】

胡 杰 给一个馍，领一个媳妇，两个人就是一辈子（版画）

依 娃 一个馍领回来一个媳妇（访谈）

### 【评 论】

莽东鸿 战犯刘峙妻弟黄兆楠的右派档案

### 【随 笔】

启 之 革命的用法——“红色话语”小议之五

### 【札 记】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七）——一个巨大的挑战

### 【述 往】

马昌海 追忆三线“五·七”厂（一）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三）——雨村读书

### 【文 摘】

米家农著 《我与“9.13”》一书摘选

1. 我的申明（1980年8月31日）
2. 《我向党的认罪书》（1980年9月15日）
3. 关于“战斗小分队”问题

### 【资 料】

沈阳一中实现革命大联合庆祝大会革命师生给毛的致敬电（1968年2月8日）

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向毛暨党中央的致敬电（1968年3月3日）

长丰县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的致敬电（1968年5月1日）

### 【读者来信】

1. 沈迈克：“反革命社会基础”是谁发明的？
2. 徐光胜谈“帮派史学”

### 【版权声明】

## 【专稿】



作者简介：范世涛（1973-）：1994-2001年先后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和南京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01-2010年在机关从事政策法规研究起草工作。2010年-2012年辞职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创新研究，出站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研究院副教授，兼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专业期刊发表30余篇

论文。《信息化、结构转变和发展政策》获信息化学术大会优秀论文奖，《包容性制度、汲取性制度和繁荣的可持续性》获《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年度优秀论文奖。主编《中国经济学经典文选》，译校有《强权与富足》等书。2010年起，致力于民间日记的收集和研究，曾发表《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多篇历史论文。

## 八一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sup>1</sup>

范世涛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出席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在集会过程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一消息公开报道后，红卫兵和大串连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兴起。因此这次大会（以下简称“八一八”）成为文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目前有两条文字大体相同的权威记录，分别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毛泽东传（1949—1976）》。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

（1966年）8月16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

<sup>1</sup> 感谢燕宇、阎长贵、王保春、张民接受本文作者的电话访问，感谢卜伟华、丁东、董国强、董然、韩爱晶、何蜀、王侍、印红标等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文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应由本文作者负责。

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军装。<sup>1</sup>

《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

（1966年）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军装。<sup>2</sup>

以上两条记录几乎一样，但《毛泽东传（1949—1976）》将中央决定八一大会的时间，从1966年8月16日进一步精确到8月16日晚上。<sup>3</sup>

相对八一八的重要程度，上面两条记载显然过于简单。比如，作为“中共中央决定”，是中央哪些人在什么会议上怎样做出的决定？会议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说毛泽东与同事在8月16日晚上做出了召开八一八大会的决定，他白天在做什么？《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毛泽东传（1949—1976）》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答案。

本文另辟途径，准备从关于1966年8月16日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的民间记载入手，部分地回答上述问题。

根据《记忆》第132期发表的谢定国日记<sup>4</sup>和本文作者收集的民间日记，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邓小平、刘少奇均到场1966年8月16日上午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sup>5</sup>，林彪还准备公开讲话。毛泽东很可能也来到会场，但

<sup>1</sup> 逢先知、冯蕙主编（20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sup>2</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34页。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记录的8月16日晚毛泽东“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军装”并不正确。毛泽东8月18日凌晨临时起意，叫卫士长陈长江给他找一套军装穿。因为事先无此准备，陈就近在中央警卫团中寻找合身的军装。其中一中队的一位干部体胖高大，毛那天穿的是他的军装，不过并不太合身。首都工作组张民这样描述：“上衣不够长，裤腿有点短，领口和腰身紧了一点，尤其是腹部，箍得紧紧的，给人一种紧巴巴的感觉。”参见张民（2009）：《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页。

<sup>3</sup> 张民的回忆录提到，“8月15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值班秘书通知‘首都工作组’，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大会，已决定于8月18日上午举行，规模100万人，广场安排30万人，70万人游行通过天安门。”这意味着决定八一大会的时间在8月15日或更早的时间。这与《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的记载明显矛盾。根据八一六八的情况，我认为首都工作组8月16日接到通知的可能性更大。参见张民（2009）：《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sup>4</sup> 扬子浪（谢定国笔名，2015）：《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9-103页。

<sup>5</sup> 《周恩来年谱（1949-1976）》、《刘少奇年谱》和《邓小平年谱（1904-1974）》均没有记录这一点。

没有公开露面。由于会议现场意外出现秩序混乱，这次接见并不成功，关于这次会议也没有进行大规模正式公开报道。

虽然8月16日的外地群众会不成功，但其宗旨与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高度一致，并直接促成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群众的决策。因此，8月16日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可以看作八一八的预演，并应纳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序列加以叙述和评论。

## 一、外地群众涌入北京，政策倾向劝回闹革命

1966年8月16日的外地学生群众会，是由于外地学生涌入北京引起的，我们就从这个话题开始。

随着文革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来到北京。1966年8月4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谈到：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成了串连。<sup>1</sup>

比中南海接待室更热闹的，是位于海淀区的北京大学。这所大学是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一时成为北京各高校和外地来京必到的“革命圣地”。校园里到处都是本校和外校师生活跃的身影；北京各工厂的群众和外地的学生、工人，也纷纷来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学习北大开展运动的经验。<sup>2</sup>据估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00多个单位的71万人次到北京大学。<sup>3</sup>仅8月12日这一天，到北大串连的高达17.96万人次。<sup>4</sup>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机要秘书宋天仪当天到北大参观了6个小时，并在次日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触和见闻：

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很多新鲜事物！观之，闻之，真令人惊叹不已！其深度、广度，规模之大，形式之多，可以说集57年反右、42年延安整风、甚至“一二·九”、“五四”运动之大成！……最轰轰烈烈的，还要算各大、专、中学了，其中以北京大学为最。那里几乎成了

<sup>1</sup> 载《红旗》1966年第11期（8月21日出版）。

<sup>2</sup> 聂元梓（2005）：《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147页。

<sup>3</sup> 燕帆（1993）：《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行》，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sup>4</sup> 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56页。

北京甚至全国“文革”的中心，或者说成了“现场会”会场，每天有几万人前往那里参观、支援、学习、取经、熏陶，有北京市各大专、中学的师生、机关干部、工、农、兵，也有千里迢迢、不辞万里之苦赶来取经的天津、河南、西安等地学生。那里真成了一个革命大熔炉！昨天，我们也去参观了一天，亲自目睹了那个轰轰烈烈的场面，到处人来人往，一簇簇、一堆堆，到处是大字报；口号声、歌唱声、大会发言声……那个场面，有点像大火车站的候车室。<sup>1</sup>

在外地群众中，天津市因地利之便，来京人数最多。京津公路上，自行车、汽车来往不绝。<sup>2</sup>如8月13日这一天，天津大学就有4000多师生步行上京告状。<sup>3</sup>中学生的革命热情也不逊色。天津一中高中毕业班的王端阳8月5日来北京串连，10日晚上骑自行车离开北京。他在日记中写下了8月10日返回天津走夜路时见到的盛况：

晚，在京津公路上遇到大批去北大的同学，约有四五百人，大家互相支持，高呼口号。还有很多女的也骑车去。92中同学送水很热情。3点钟到学校。我们准备成立天津革命造反派。这次回来就是要造市委的反。<sup>4</sup>

外地学生（尤其是天津）大批来到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很快人满为患。为了解决外来参观者的食、饮问题，校园里到处设立了小卖部，出售面包、汽水、油饼、冰棍、西瓜等等；远道而来的学生，男男女女都休息在树下、草地上、饭厅里。<sup>5</sup>8月12日，除了同学宿舍，北大一食堂、二食堂、三食堂、六食堂、员工食堂，全部住满了人。13日去食堂吃饭，就会看到苇席满地，许多中学生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8月14日，在北大住宿的天津同学已经达到2万人左右；而当天至下午6点为止，来北大参观的13万人中，天津同学就达到1万人。<sup>6</sup>

<sup>1</sup> 宋天仪（2013）：《文革日记》，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13页。

<sup>2</sup> 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6页。

<sup>3</sup> 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56页。

<sup>4</sup> 王端阳日记，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0d1460100ry79.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0d1460100ry79.html)。

<sup>5</sup> 宋天仪（2013）：《文革日记》，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sup>6</sup> 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6—17页。

北大附中跟北大的情况类似。附中66届某班同学在8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现我校住进外地学校好像1500人。我们教室住进天津来的11（位）女生，我们打扫一下，把塑料单、席子、毛巾被、毯子和棉被，能拿的都拿出来供她们。

<sup>1</sup>

三天后的8月15日，住在北大附中的天津同学已经高达7000多人。<sup>2</sup>

对于外地学生群众纷纷涌入北京的局面，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政策倾向是劝告回去。8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份内部的汇报提纲中写道：“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京者要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7000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sup>3</sup>

新北京市委在派人调查北京大学人满为患的情况后，决定在8月15日、8月16日两天北京大学停止接待外地群众。<sup>4</sup>该决定得到了落实。8月15日上午，北大附中广播了给天津同学书，希望他们按社论精神学习，以本单位为主，回天津去，就地闹革命。<sup>5</sup>

## 二、政策方向变化，

### 中央文革和新北京市委热烈欢迎来京学生

但是，政策很快发生了方向性变化。新政策是8月16日陈伯达、康生、李雪峰、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的群众会上公开宣布的，他们都表示热烈欢迎来京学生。

这次大会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康生在会上一个一个地介绍了出席大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

<sup>1</sup> 北大附中66届高中2班某同学日记，1966年8月12日。范世涛收集。北大附中有的同学初中在天津就读，“文革”开始后曾到天津串连。北大附中高中68届某班同学与范世涛的电话笔记，2015年3月1日。

<sup>2</sup> 这是1966年8月15日上午北大附中广播站广播的给天津同学书里给出的数字。参见F日记，1966年8月15日，手稿。范世涛收集。

<sup>3</sup>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2006）：《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唐少杰校，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109-110页。

<sup>4</sup> 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7页。

<sup>5</sup> 北大附中66届高中2班某同学日记，1966年8月15日。范世涛收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

常写文章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同志。

你们在报纸上常见他的名字，常写文章的戚本禹同志。

常写反修文章，写九评参加者王力同志。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杂志副编辑穆欣同志。

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同志。<sup>1</sup>

从这个名单看，除了顾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人物均已到场。其中，江青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身份引人注目。

早在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讲话时首次公开称“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sup>2</sup>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其实已经到8月30日，通知说：“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sup>3</sup>

当时，江青是一位副部级干部，在几位副组长中级别并非最高。如同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还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他当时还受毛泽东的委托，过问北京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sup>4</sup>而江青的排名却在王任重前面，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决非康生乃至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决定，只可能是毛泽东的意见。而康生在八一六会上重申江青的第一副组长身份，其中含义耐人寻味。<sup>5</sup>

从康生介绍的与会名单看，八一六似乎是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一次群众接见会。其实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喧宾夺主所造成的错误印象。这次会是新北京市委和

<sup>1</sup>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康生同志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7年，第123页。

<sup>2</sup> 阎长贵、王广宇（2009）：《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

<sup>3</sup> 参见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118页。

<sup>4</sup> 王广宇（2011）：《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一些资料》，[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06/23/49267\\_146336304.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06/23/49267_146336304.shtml)。

<sup>5</sup> 江青在主持8月16日的会议时，根本没有提及王任重，更没有请他讲话，这反映出她对王任重的不满。8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有关劝告来京学生回去就地闹革命的汇报提纲，很可能是负责过问北京大中学校运动的王任重主持

北京大学举办的。<sup>1</sup>

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是这次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不过只是一句开场白：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主持。<sup>2</sup>

李雪峰负有领导北京运动的责任。在6月初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刚刚公布时，各大单位敲锣打鼓到北京市委送贺信和声援大字报，李的声望达到一生的顶峰。但是，7月下旬，新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做法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随后工作组撤出，李的威望急速下降。在中央文革小组大员集体在场的情况下，他的八一六开场白也只能这样简而又简了。

李雪峰开场白之后，江青主持了这次大会。她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简单表示“受毛主席委托”向大家问好，“毛主席向你们致崇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随后，就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陈在四天前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成为排名第五的中共领导人，但这一新的政治身份还没有公开宣布。

也许因为北京正在下雷阵雨，而且前一晚已经下过一场大雨，陈伯达在讲话中特别引用了毛泽东说过的“经风雨，见世面”。他说：

你们来到伟大的首都北京，来到这个祖国的首都，来到祖国的革命中心，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

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而是要在大风大浪里成长。<sup>3</sup>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我们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斗争，表现出你们有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能够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这次辛苦，表现你们的英雄气概，但是，这还是初步的考验，你们还要经过千百万次的考验，还要经过长期的考验。要在群众的泥巴

<sup>1</sup> 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8页。

<sup>2</sup> 《八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李雪峰、姚文元等同志讲话》，北京一零一中联络组整理。铅印本。在有关1966年8月16日工人体育场首长讲话资料中，绝大部分仅仅记录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但北京一零一中学联络组整理的版本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该版本全文记录了李雪峰的讲话内容。

<sup>3</sup> 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报道了毛主席“最近又一次在长江的滚滚波涛中破浪前进，畅游一小时零五分，游程近三十华里”的消息。

里滚过千百万次，把自己变成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8月12日的汇报提纲还建议劝告外地学生“回去闹革命”，为什么现在只字不提劝回，只对来京学生表示鼓励和欢迎呢？如果说前几天建议劝告外地学生回去是因为“吃饭、睡觉都成问题”，“衷心地欢迎”外地学生又是为什么呢？陈伯达讲话中透露了重要信息：

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由你们——毛主席教育下的新一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sup>1</sup>

也就是说，之所以欢迎外地学生来，是因为这可以“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sup>2</sup>除了陈伯达的上述理由，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讲话中给出了欢迎外地学生的另一个说法：

你们要走革命的道路，来到革命的首都，来到毛主席所在地——首都，来交流经验，来互相传播革命道理。我们对你们这种不远千里来到首都的革命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sup>3</sup>

也就是说，因为同学们来到首都表明他们“要走革命的道路”，来到这里可以“交流经验”、“互相传播革命道理”。这实际上正是大串连促使文革全面发动的基本机制。外地学生回去之后，往往成为各地文革的煽风点火者。<sup>4</sup>

<sup>1</sup> 陈伯达（1966）：《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红旗》，1966年第11期，第16—17页。

<sup>2</sup> 西安一所中学的造反派头头Y参加了这次外地学生群众会并确实留下了深刻、长久的印象。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他与徐友渔交谈时仍然能够大段背诵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他背诵时一往情深，既充满对陈的敬佩，又充满对往事的留恋和自豪。”参见徐友渔（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sup>3</sup>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康生同志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7年，第123页。

<sup>4</sup> 以第一部分提到的天津一中王端阳为例。他8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京串连期间，先后去抗大展览（没让进）、二十五中、灯市口男中、女中、女十二中、北京工业学院（没找到）、北京经济学院、机械学院、

值得注意的是，李雪峰不止说了一句会议开场白，还在陈伯达之后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我代表北京新市委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在北京各学校进行参观，进行访问。同时他们也向同学们学习，交流经验。同学们来到以后，碰到困难，我们招待工作、布置工作做的不太好，请同志们原谅！

从中央文化大革命决定发布以后，全国各地、华北各地、北京各地、各学校、各单位都在学习，按情况运用中央这个决定，实行这个决定。你们可以提出意见，我们可以布置工作、布置交通、布置车辆，帮助你们，按你们的意见回去。如果同志们愿意在北京还留一段时间，还要进行什么参观访问，我们也积极进行帮助！

向同志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sup>1</sup>

在上述讲话中，李雪峰虽然也表示欢迎外地群众，但重点还是具体接待问题。所谓“同学们来到以后，碰到困难，我们招待工作、布置工作做的不太好”，反映了实际遇到的困难；他以外地学生未必能听懂的婉转方式希望大家“回去”，理由是“全国各地、华北各地、北京各地、各学校、各单位都在学习”中央的决定；至于不愿意回去的，他说“我们也积极进行帮助”，口气上有一点保留，但毕竟代表新北京市委作出了接待承诺。

### 三、六位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

#### 林彪第一次公开露面戏剧性收场

除了李雪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这次外地学生群众会的还有更重要的中央大员。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66 届高中某班同学参加了工人体育场的外地学生

---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大学，感到“北京学生敢斗争，敢辩论，敢坚持，这很好。天津总是清一色。北京领导全下来，可天津领导发号施令后就见不着面了。”“在京很多事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造反，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造谁的反。我真想马上到天津，大造市委的反。”因此，在没有返回天津的时候，他就写了《我们要造市委的反》，并印出 40 份寄回天津，请朋友到各校散发。去清华大学听关于工作组叶林问题的辩论后，他感到“启发很大”，想到“天津市委和工作组，回去一定要好好反反”。8月11日，王端阳骑车回到天津，当天就召集了各校学生群众会介绍北京经验，提出“我们要造天津市委的反，讲了很多事实”。稍后几天，他还写信给聂元梓，希望聂介绍 618 事件，以便和天津的情况相对照。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0d1460100ry79.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f0d1460100ry79.html)。

<sup>1</sup>《八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李雪峰、姚文元等同志讲话》，北京一零一中联络组整理。铅印本。

群众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明确记载了林彪和周恩来的到场。他这样写道：

上午说在工人体育馆开会。早上起床很困，还是起来，吃过早饭我们几人就在8：30开车去了。

今天主要是给外地同学开的会，江青同志主持大会，陈伯达同志、李雪峰同志、姚文元同志、康生同志先后讲了话。主要是欢迎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学习经验。要好好学习十六条，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放开眼界看未来，乘风破浪向前进。

后来休会，休息后周恩来同志、林彪同志也来了。林彪同志原来要给大家做指示的，但这时很多人，尤其是天津来的，纷纷从看台上跑下来，从门口冲进来，挤到主席台前的操场上，人越挤越多，秩序很乱，中央首长怕挤伤人，只好宣布散会。真是遗憾，林彪同志的指示没听成。<sup>1</sup>

这则记录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李雪峰的讲话只是这次会议的第一段落；休会之后，林彪、周恩来来到会场，而且林彪准备在会上讲话。只是由于现场出现混乱，会议不得不提前散场。根据会议第一段落共5个人讲话推测，休会的时间应已临近中午。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谢定国（扬子浪）在1966年8月16日的日记里不仅记录了周恩来和林彪的到场，而且有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到场：

今天上午十点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外地来的同志十万人参加，北京大学近两千名同学作为纠察队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开始进行得较好，江青主持会议，陈伯达，李雪峰，姚文元，康生讲了话。后来少奇，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林彪同志来了，秩序很乱，挤得厉害，眼看要出大事了。林彪同志在话筒前面站了好一会儿，也没讲，后来江青同志当机立断宣布散会，听说少奇同志还没有下车就驱车回去了。

天津不但大学生来，中学生来，小学生也来了不少。

陈伯达同志说：我们要顶天立地，经得起一切挫折，一切困难，一切磨练，

---

<sup>1</sup> 北大附中66届高中2班某同学日记，1966年8月16日。范世涛收集。

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进。

休息以后的大会开得十分乱，林彪同志在话筒前讲了十三次“同志们，静一静”，还是讲不下来。总理亲自走出主席台让包围主席台的同学（从四面八方，甚至从主席台顶盖上面）回去，冒着大雨淋了好一会儿，可没人听。因此江青只好说：“同学们，散会了，我们走了！”

今天上午的会是北京市委与北京大学主办的。两次大会<sup>1</sup>，一些天津同学无理取闹，乱挤一通，挤伤了很多。特别是今天上午的会议，气得北大附中红旗战士（全部穿的军装）大骂混蛋。

因为天津学生的冲击，北京秩序显得很乱。<sup>2</sup>

谢定国的日记表明，出席八一六大会的至少有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其中，林彪的出场尤其值得重视。

在4天前的8月12日，也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中央领导机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改组，中央一、二线领导制度取消，毛泽东将领导权直接集中到自己手中；林彪成为新体制下排名第二的中共领导人，也成为毛泽东公认的接班人。不过，消息还没有公之于众。

在取消一、二线制度后的新组织领导体制下，林彪如何担当二号人物的重任呢？他在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所说明：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sup>3</sup>

<sup>1</sup> 另外一次指的是8月15日晚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斗争黑帮分子陆平彭珮云大会。

<sup>2</sup> 扬子浪（2015）：《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载《记忆》第132期，2015年6月15日，第18页。

<sup>3</sup> 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01—202页。

在上引段落中，林彪用“心情沉重”、“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来描述自己成为排名第二的领导人的经过。不能有“另外做法”，“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唱对台戏”，既是对此前一、二线领导体制的含蓄批评，也说明了新体制下的行动戒律；至于“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则是他的基本政治纲领。<sup>1</sup>这个政纲令人想起叶群笔记中记录的林彪谈话：“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零一<sup>2</sup>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sup>3</sup>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sup>4</sup>

根据上述政治纲领，8月16日林彪出席外地学生群众会，当然也是代表“一号利益（应声虫）”而来，是“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具体表现。

林彪的这次出场显然不成功。他在话筒前面向外地学生群众讲了十三次“同志们，静一静”，但会场秩序极为混乱，他还是无法讲下去。在眼看要出现事故的情况下，江青宣布散会。

林彪在成为中共中央排名第二的领导人之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就以这样有些荒诞的方式结束了。<sup>5</sup>

#### 四、林彪来了，毛泽东是不是也来了？

林彪准备讲话却没有讲成，但出场并准备讲话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同寻常。

在整个“文革”时期，林彪一般在毛泽东出席的场合才直接面对群众公开讲话。例外情况似乎只有一次，即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中毛泽东被迫离开武汉去上海，林彪7月25日在天安门举行百万人军民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

<sup>1</sup> 这一行动方针并不仅仅是林彪一个人的，周恩来、江青等人也是如此。不过具体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sup>2</sup> 指林彪。

<sup>3</sup> 指毛泽东。

<sup>4</sup> 转引自张素华（200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sup>5</sup> 通常的印象，林彪在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副手以后第一次公开亮相是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首都和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06页。

北京。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sup>1</sup>

既然这样，根据林彪8月16日来到工人体育场并准备公开讲话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推测，毛泽东其实也来了呢？

对于这个疑问，我托韩爱晶请教聂元梓。聂元梓表示，“记不清楚了，应该没去”<sup>2</sup>；韩爱晶也倾向于认为，八一六毛泽东并没有来工体。<sup>3</sup>

但我认为，毛泽东当天很可能也来到了工人体育场，但没有公开露面。北京大学附属中学68届高中同学、红卫兵燕宇最先提醒我这一点。<sup>4</sup>他当时被派去工人体育场“站标兵”，维护会议秩序。下面是我笔记整理的燕宇回忆：

那天毛主席没有露面，现场也没有听到服务人员或首长说毛主席来没来。红卫兵当时并不直接了解毛主席是不是来了。

开会的时秩序失控。先是有人越过栏杆从看台进入操场内，这还并不很严重。但有人从操场翻过栏杆跳到主席台，离领导只有一两丈距离。这样会对领导造成直接威胁。红卫兵就全急了。会议没有进行下去。

在给首长开路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吉斯车。当时总理是吉斯车。<sup>5</sup>林彪什么车不知道，江青坐什么车也不知道。<sup>6</sup>但我当时就知道，只有非常核心的极少数中央首长才乘坐吉斯车。总理的吉斯车车号我知道，我看到的那辆吉斯车不是总理的。过了几天，听我的一位同学说，毛主席那天也去了。我的那位同学x，家人是负责安全的中央高层干部。<sup>7</sup>

从上引回忆看，燕宇判断毛泽东8月16日上午来到工人体育场的根据是两条：一是亲眼看到吉斯车，而且从车号看并不是周总理的专车。二是8月16日后不久，就听同学说毛主席那天也去了。

<sup>1</sup> 戚本禹这样形容：“林彪对七二〇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参见戚本禹（2015）：《回忆江青同志》，红歌会网，2015年7月29日。

<sup>2</sup> 2015年6月20日下午，我托韩爱晶请教聂元梓这一问题。韩先生很快电话回复，转告了聂元梓的上述回答。

<sup>3</sup> 韩爱晶与范世涛的电话，2015年6月20日下午。

<sup>4</sup> 燕宇说，“当时，实际上主席都到了。”燕宇与范世涛的电话笔记，2015年3月28日。

<sup>5</sup> 陈伯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他会乘坐什么车呢？据王保春告知，陈伯达原乘坐吉姆车，地位发生变化后配的是红旗车。（范世涛与王保春2015年3月20日下午的电话笔记）

<sup>6</sup> 2015年3月19日，我电话请教阎长贵先生。他当时在钓鱼台负责处理群众来信，1967年1月9日至1968年1月9日担任江青的秘书。阎回答说：江青平时坐红旗车，有时是吉姆车。

<sup>7</sup> 根据2015年2月28日、3月3日范世涛与燕宇的通话笔记整理。

毛泽东当时的座驾，是斯大林赠送的吉斯 115。该车系防弹车，纯手工制作，产量有限。车长 6 米，宽近 2 米，明显比其他的轿车阔大。当年以吉斯车为专车的，除了毛，只有新中国成立不久最主要的领导人。随着 1960 年后中苏关系大为恶化，苏联不会再赠送中国这种车，中国也不会再进口苏联车，60 年代新崛起的中央领导人当然也不会再分配到吉斯车。按照这样的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选后的中央常委中，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才有条件乘坐吉斯车。既然 8 月 16 日燕宇看到的吉斯车不是周恩来的，确实很有可能是毛本人的座驾。<sup>1</sup>

1966 年 8 月 16 日后的几天，燕宇的同学告诉他，毛主席 8 月 16 日也去了工人体育场。这一消息是否可信呢？如果燕宇的这位同学（以下简称 X）有机会得到第一手的信息，并且没有夸大其词的习惯，那么，这一信息就比较可靠。据燕宇告知，X 的父亲负责安全工作，当天肯定也参加了 8 月 16 日在工人体育场的会议，因此 X 有条件获得关于 8 月 16 日毛泽东是否出席这次会议的权威信息。我就燕宇转告的 X 的话请教北大附中另一位校友 XM。XM 这样评论：“那就是可信的，因为 X 不会瞎编。”<sup>2</sup>显然，X 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他的话具有权威性。

## 五、毛泽东常常不在会议开始露面

如果从毛泽东的习惯观察，他 8 月 16 日到场但没有公开露面并不奇怪。

毛泽东常在幕后听会，并选择在会议中间或结束时出场，或者到场但不出场。他的这一习惯至少可以追溯到 1964 年。北京四中 68 届初一（2）班的陈凯歌参加了这年的春节晚会。据他回忆：

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sup>3</sup>

<sup>1</sup> 李鹏当时是北京供电局主要负责人，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负责天安门检阅活动的供电安全。他记得，除了毛泽东以外的领导同志，“坐的都是国产的红旗牌轿车，领导同志下车后，汽车都停在变电所附近，一直排到端门。”（李鹏（2014）：《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国电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58 页。）在会议之前的两天，很可能座驾也是这样安排的。

<sup>2</sup> XM 给范世涛的电子邮件，2015 年 3 月 22 日。

<sup>3</sup> 陈凯歌（2012）：《青春剑》，载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 年的北京四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91 页。

而1966年7月29日，也就是8月16日外地学生群众会两个多星期以前，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革命学生代表大会”，陈凯歌再次看到类似的戏剧性场面：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他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sup>1</sup>

上面两次都是八一六之前的例子。八一六之后，也有类似的例子。

如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也坐在主席台上。回到《人民日报》社后，他说那

---

<sup>1</sup> 陈凯歌（2012）：《青春剑》，载北岛、曹一凡、维一编《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90页。关于这一场面，穆欣、毛毛、阎淮等多位当事人的回忆中均提到了，细节并不完全一致。据穆欣回忆：这天会议中间，我偶尔走到主席台后面时，见毛泽东正坐在118室门外椅上谛听前台的讲话。那时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热正在加温，群众殷切盼望见到毛泽东。见他跟我打招呼，曾经问他怎么不到前台？他微笑着摇摇头。回到前台，其他曾到后台见过毛泽东的同志都在猜他出不出来？这时刘少奇正在讲话。讲到最后，他说：“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想必这些话使毛泽东不快，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疾步从后台走出来。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弯腰曲捡拾，毛泽东已到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他没有讲话），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穆欣（1994）：《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90页）而阎淮回忆的场景是这样的：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语音未消，还没来得及收起讲稿走开时，毛泽东突然从后台闪现。毛疾步走带出的风，把刘的讲稿扇到地上，毛没有理睬刘，径直走到舞台前沿把刘撇在一边。刘十分尴尬，弯腰捡起讲稿，摘下眼镜退到舞台后面，和周邓等人站成一排。毛泽东向学生们挥手，我们边热烈鼓掌、边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万众欢腾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经久不息。盛夏时节，首长们都是短打扮，白色短袖衬衫和灰色长裤；只有毛仍穿着深灰色中山装，脸色铁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阎淮（2015）：《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因此，据穆欣和阎淮的上述回忆，刘少奇讲话结束余音未消时毛泽东出来，并没有打断刘少奇讲话；毛泽东出场时走得很快，与陈凯歌所说的“信步而出”不同；而且，阎淮谈到毛泽东“脸色铁青，神情严肃，没有一丝微笑”，这与陈凯歌回忆的“慢慢地微笑了”也不一样。

天其实毛也去了。他上厕所时走到后台，先看见当时老跟在毛泽东身边的小护士，随后看见毛坐在那里。但这次会从始至终毛泽东没有公开露面。<sup>1</sup>

再比如1968年3月24日晚9:30至次日凌晨一时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大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讲话后，台上的幕布拉上了。但很快幕布又拉开，毛泽东从右侧（北侧）出现在主席台，其他人也跟随而来。毛边走边向台下招了招手，一脸阴云，一言未发。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sup>2</sup>

以上四次都是毛泽东到场但并不在大会一开始就现身的例子。其中第三次他到场在台后旁听，始终没有公开露面。

因此，毛泽东在1966年8月16日上午来到工人体育场但没有公开露面并不奇怪——这符合他的行事习惯。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毛泽东很可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走到前台。因为1966年8月16日的外地学生群众会是第一次公开欢迎串连的大会，也是林彪成为其接班人及仅次于毛的中共领导人后的第一次公开出场，毛泽东当然会非常关心，有充分理由到场并准备选择适当时机出来表示支持。而一旦他在林彪讲话后公开现身，无论他讲话还是不讲话，媒体都要铺天盖地地进行报道。在刘少奇、邓小平也来到现场的情况下，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变动信息就可以通过新的顺序排名公开传递出来了。

当然，大会的意外情况使原来的剧本没有顺利进行下去：林彪没能讲成，毛泽东没有公开露面，媒体没有进行宣传报道。几十年过去，知道林彪曾出席8月16日外地学生群众会的人已经不多；直接了解并记得毛泽东当日来到工人体育场的人更屈指可数了。

## 六、会议秩序维护者回忆的混乱细节

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因会场秩序出现混乱而提前结束。对于混乱的细节，前面引用的两份日记都很生动。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当事人的回忆。

1966年8月中旬，北京海淀区中学的一些红卫兵经常被派到群众大会上维

<sup>1</sup> 王若水（2002）：《新发现的毛泽东（下）》，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第564—565页。

<sup>2</sup> 邱会作（2011）：《邱会作回忆录（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1—64页；张景发（2009）：《岁月留痕》，北京：自印本，2009年，第150—151页。

持秩序，作用多少有点像 10 天后的“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8 月 16 日的外地学生群众会也是这样。北大附中红卫兵燕宇和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红卫兵肖淮海都因此参加了会议秩序维持工作。据燕宇回忆：

当时包括北大附中在内的海淀区红卫兵负责维持秩序。1966 年 8 月 15 日，我们已经参加了斗争陆平的会议<sup>1</sup>，完了之后没回学校，在工人体育馆住了一晚。说是住，其实就是和衣而睡。一人发了 2 包饼干。

第二天参加了八一六接见。周恩来、林彪到没到，我真没印象。我们负责现场维持秩序，站标兵去，对会的内容并不太关心。但陈伯达肯定到了，而且他在那个会上宣读的《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

会议本来还要继续进行，就像你说的，天津来的红卫兵要见首长。一开始是从看台往场内涌。后来是从场内向主席台涌。我们整个的警戒线就撤到主席台下面，我站到了主席台前边。那时真是打啊，你不打他能走吗？

警卫战士也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又把我们调到主席台外面那个门去了。那里也围上人，想从大门、正门往主席台的休息室冲。所以调我们把那些人驱散，当然也包括警卫战士。我们手拉手站成一道，甚至几道人墙，来开辟道路。<sup>2</sup>

肖淮海是 8 月 16 日一大早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他记得周恩来来到会场后发生了混乱：

很快大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周恩来。

“总理来了！总理来了！”消息立刻传遍各个看台，人头顿时攒动起来，目前也齐聚到主席台上。

总理稳步走到话筒前，准备主持大会。

可就在这时，不知哪个胆大妄为的红卫兵翻过看台的栏杆跳入场地，向主席台方向跑来。这个害群之马的举动，立刻引来数千人效法，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冲来。

---

<sup>1</sup> 1966 年 8 月 15 日，工人体育场冒雨举行斗争陆平大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67 届孙维藩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天一直下大雨，我们在跑道上淋着开了五六小时会，夜一点多才归。”（参见孙维藩：《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 58 页）另据聂元梓回忆：当时在王任重领导下，我主持过一次批斗陆平的大会。实行“五不”。即：（1）不挂牌子；（2）不戴高帽；（3）不罚站；（4）不坐“飞机”；（5）允许陆平对批判申辩自己的意见。虽然作这些规定，但批判就是错误的。（参见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第 478 页）

<sup>2</sup> 燕宇与范世涛的通话笔记，2015 年 2 月 28 日。范世涛笔记。

我们几所学校负责保卫的红卫兵一看大事不好，就立即进入场地。大家马上手臂挽着手臂，迅速在主席台前的跑道上筑起几道“人墙”。

“人墙”刚立稳，“人潮”就涌上来，并一点一点地推着“人墙”向主席台前挪动。

这时，总理的声音响起来了：“红卫兵小将们！大家不要挤，我们现在开会。下面，请林副主席讲话。”

接着，就见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头戴灰色便帽的矮瘦男人走上讲台。

但那时，红卫兵对中央高层人事的变动尚一无所知。

“人潮”和“人墙”之间的搏斗、抗争、拉锯正愈演愈烈。

林彪刚要开腔，突然更“可怕”的事发生了。

十几名外地红卫兵竟然跑到主席台的顶棚上，并趴在顶棚前沿，露出小半个身子向下探望。总理一个劲儿地向他们摆手，示意他们马上离开，可这些人依然故我，一动不动。

“人墙”中的我，气愤至极，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这些小子拉下来。可当时我们也是爱莫能助，双臂正被“捆绑”在“人墙”里，双脚用力蹬着地面，可脚还不停地在泥里打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上面胡闹。

总理立即亲自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但主席台前的秩序依然混乱。

十多分钟后，我看到主席台上的人已经全部撤光了。

“人潮”终于停止了“咆哮”，我们也终于松了“绑”，顿时我感到骨头架就像散了一样。

“潮水”退了，该拾“贝”了。一会儿工夫，工体工作人员在主席台前的空地上捡到的五花八门的鞋子，就足足装了两大筐。<sup>1</sup>

热情洋溢的外地学生虽然搞砸了这次会，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学生会后从工人体育场来到群众接待站。从16日傍晚到17日傍晚，整整一天一夜，不时在接待站发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呼喊。特别是17日晚19时，

<sup>1</sup> 肖淮海（2009）：《追随：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一生自述（上）》，济南：黄河出版社，2009年，第64—65页。

呼喊声尤为洪亮整齐，他们希望再次出现毛泽东8月10日出现在群众接待站的神话。这个神话竟然真的变成了现实。<sup>1</sup>

## 七、作为八一八预演的八一六

8月17日晚，外地来京学生在群众接待站得到毛泽东同意接见的消息。

其实，毛泽东在8月16日晚已经决定8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大会，接见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sup>2</sup>消息暂时没有告诉同学们，很可能是安全方面的考虑。

8月16日上午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和晚上的决策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八一六出现的秩序混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这势必强化毛泽东利用这热情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而当时出现的拥挤局面，表明需要一个比工人体育场更大的场地来满足接见革命群众的需要，天安门广场当然再合适不过了。从这个角度看，恰恰是八一六上午的失败，直接促成毛泽东当晚作出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的决定。

不仅如此，八一六和八一八开始的8次接见红卫兵的政策思想和接见宗旨高度一致。有理由认为，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实际上正是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预演，需要放到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同一个人序列来研究和评论。

首先，八一六第一次向外地学生来京发出了公开的邀请，实际上是官方第一次公开宣布支持大串连。八一八则进一步使大串连势不可挡地迅猛兴起。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呢！”<sup>3</sup>他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其他的领导人显然并不理解这一点。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文革”时，派出大量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这些工作组积极推动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希望控制运动的方向和节奏。跨单位、跨地区的串连活动明显增加了控制的难度。因此，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1966年6月18日晚10点，给北大

<sup>1</sup> 见“文革史话的博克”（2014）：《文革史话》第127回：《数十万，外地学生集北京 急筹备，准备接见红卫兵》，[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02daa010101fhu.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02daa010101fhu.html)。

<sup>2</sup>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4页。

<sup>3</sup> 王年一（1988）：《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7页。

师生员作的工作报告中，要求“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新秩序”，不许搞背着工作组的秘密活动，不许参加外单位的斗争会，实际上发出了串连禁令。<sup>1</sup>北大的经验很快通过中央转发的文件具有了指导全国的意义。校际之间的交往受到了各学校工作组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文革”的时期，“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大闹一场”并没有成为现实。毛泽东7月中旬回到北京后看到的是“冷冷清清”的局面。

1966年7月28日，新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这样一来，单位之间串连的主要约束就被拆除了。实际上这也正是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外地群众纷纷涌入北京的基本背景。

在这种局面下，毛泽东因势利导，8月13日指示，派车到杨村车站接天津大学4000多师生来到北京，这些天大师生以“毛主席的客人”身份受到热情接待。<sup>2</sup>这当然只是个案的推动。

中央文革小组在八一六大会上向外地学生发出公开的热情邀请，则标志着支持串连的毛泽东思想终于在政策层面落实下来了。这距离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表示希望支持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大闹一场”，已经有两个多月。

当然，大串连在全国范围内加速迅猛地兴起，实际上是八一八的消息传递到全国各地之后。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作者将八一八作为大串连的分水岭。<sup>3</sup>但正如第一部分所描述的，来京串连活动在7月底工作组撤出后已经蓬勃兴起，八一六实际上已经确立了热烈欢迎外地学生来京串连的政策方向，新北京市委在会上也已经承诺在接待方面给以支持。就支持大串连这一政策方向来说，八一八与八一六一脉相承，并没有根本性突破。

**第二，八一六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并支持串连与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根本宗旨完全一致。**

本文前面引用了陈伯达八一六讲话所给出的支持串连理由。为了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理由对照，有必要再引用一次：

<sup>1</sup> 原蜀育、邱心伟主编（2009）：《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9页。

<sup>2</sup> 卜伟华（2008）：《“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第256页。

<sup>3</sup> 有的作者甚至称八一八“揭开了外地红卫兵来京‘大串连’的序幕”。这一提法并不准确。白振刚（2006）：《追忆接待红卫兵和上访职工工作》，载《纵横》，2006年第8期，第12页。

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由你们——毛主席教育下的新一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sup>1</sup>

这个理由与戚本禹、王力回忆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思想是一致的。

戚本禹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向毛泽东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毛这样回答戚本禹：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sup>2</sup>

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说，苏联出修正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要防修，就要让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见到我，“越多越好”。这话毛泽东说了多次。<sup>3</sup>

因此，让越多越好的年轻人见到自己，并“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正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根本考虑。

<sup>1</sup> 陈伯达（1966）：《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八月十六日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会上的讲话》，载《红旗》，1966年第11期，第16-17页。

<sup>2</sup> 项观奇(2013)：《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乌有之乡网站 <http://www.wyxs.com/article.php?id=4558>。

<sup>3</sup> 王力（2001）：《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647页；麦克法夸尔、沈迈克（2006）：《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星克尔（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110、509页。

这个考虑其实已经由陈伯达在8月16日群众会上公开表达出来了。这就是他说的“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云云。他的八一六讲话不仅仅是个人意见，更反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基本思想。

**第三，八一八继续完成了八一六所没有完成的任务。**

与八一六相比，八一八大会会有三点引人注目：一是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穿上了绿军装，并接受了北师大女附中同学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二是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毛泽东审阅的讲话，其中充满了“打倒”；三是通过新华社报道，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结果。<sup>1</sup>

在这三点不同寻常之处中，除了第一点，后面的两点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完成八一六没有完成的任务，只是比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要晚两天。而毛泽东让红卫兵戴上红袖章，则是即兴之举，但却因此永载史册，并成为红卫兵印象深刻的首要事件。

当然，由于八一六并不成功，它的历史影响也就比八一八小得多。但这不能成为否认八一六是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预演的理由。

2015年6月21日定稿，8月7日修订

---

<sup>1</sup> 王年一（1988）：《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67页。

【要有光】

给一个馍，领一个媳妇，两个人就是一辈子

胡杰 版画



【要有光】

## 一个馍领回来一个媳妇

依 娃

受访人：李春花，女，70岁，陕西省周至县尚村乡疙瘩头村人。

逃荒前为甘肃省甘谷县李家堡子人。

采访时间：2013年9月5日

录音长度：25分钟。

大饥荒饿亡者：

李××，男，半岁，甘肃省甘谷县李家堡子人，饿亡。

**前记：**村里人带领我去找李春花，她满头白发，但是身体不错，说话声音大，性格开朗。他的丈夫陈志创也在家，个子瘦高，身体不太好。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喜欢不时的发表意见。他当时在宝鸡火车站附近修铁路，非常了解逃荒妇女，被陕西男人直接领回家的情况。算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依：姨，你多大岁数了？

李：七十了。

依：你老家在哪个县？

李：甘谷县。甘谷的李家堡子，从山上翻过去就是王家川，大石头。甘谷就是天水，我娘家远得很，还在西北哩。

依：你那时家里生活怎么样？

李：家里娃娃来，说现在变化了，都好着哩。那阵，不行，不行，是饿死人的年份嘛。我给你说，有吃就吃，没有吃就没有吃，没有人管！没有人管！我从小没有父母。没有人管。

依：你在甘肃和谁一起生活？

李：这家管两天，那家管两天。

依：你给队里干活吗？

李：我没有做，我放羊哩。给队里放羊哩。

依：人家给你吃吗？

李：吃嘛，嫂子哥哥多少管一下。

依：那时能吃饱吗？

李：吃不饱！

依：你偷着吃吗？我不是说你人不好，就是问问那时的情况。

李：不偷，咱年纪小，偷谁的？哈，哈哈。

依：那饿了怎么办？

李：你问这样的话？饿了吃些剩饭、炒面、汤汤水水。吊命着哩，别人管着咱，咱年纪小，不由咱。

依：你哥哥去修过洮河吗？

李：去了，我没有去。受苦哩，炸山哩。

依：人是不是最后都（饿）肿了？

李：人肿，是这样子，吃那个麦糠衣子（麦壳），人就发胀，虚胀。我没有吃那个，我逃出来早，没有吃那个。那时候人饿死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是个坏年份，六零年就是坏年份。

依：什么叫坏年份？

李：意思就是坏年份，就像蝗虫吃豆子，遭了年景了。为啥是坏年份？就是入了社了，干部能吃些好的，农民就吃不上……。我记得单干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地主，还有高骡子大马。

依：最后都拿去了吗？

李：人家都拿走了。我们家地主成分富得很，高骡子大马，还有羊群都让人家拉走了。羊多得很，最后留了十四个羊，让我放哩，最后都拉走了。

依：打你爷爷、大不？（斗地主分子，靠暴力夺得田产）

李：咋不打？那样的社会，怎么不打？斗地主富农哩，给你插白旗子。我父母去世的早，他们有四个女娃娃，到庙里求了一个男娃娃，娃娃半岁就饿死了，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依：你说你兄弟饿死了？

李：嗯，我们几个女娃娃大，那个男娃最小。

依：娃娃叫什么？

李：还有啥名字？咱不知道。半岁娃没有名字。

依：那阵干部到家里找粮食吗？

李：饿死人的年份，到哪里找粮食？我那时没有人管了，就让你放羊去。有大人管的娃娃不放羊。

依：你不害怕狼吃你吗？

李：人家狼不吃我嘛。那个狼从我身边走过去，把我的衣服咬烂了，没有吃我，把一个羊叼走了。

依：啊哟，你不害怕？

李：不知道害怕，才十三四岁，一个狼把一个羊叼走了。爷爷呀，羊让狼叼走了，人家不吃我嘛。

依：你村子里饿死的人多吗？

李：多得很，多得很。

依：你看见了吗？

李：我长着眼睛，看不见人死吗？人害了那个肿病，都死完了。满山上、半路上都是死人。你想想，陕西只来了几万人，那一年，国家又要把人送回去。有的舍不得老汉（丈夫），还有娃娃，就留在这里了。有的就回去了，甘肃慢慢的条件也好了。

依：你是哪一年过来的？

李：我是五八年过来的。我来的早，我姐姐说：“你咋不逃荒？咋不跑？饿死人了。我过来早得很。

依：你从甘肃来的时候多大了？

李：十八九岁。我来的时候，我舅舅把我领到我姨家，她家有个儿子，说让我成个家。我表哥不愿意，说我们是表兄妹。人家不愿意，咱就往外面跑。人都往陕西跑，我就说：“陕西是个啥样子？”我也往陕西跑，上了车乱七八糟的。咱年纪小，就往外跑。

依：谁把你领来的？

李：我自己闯过来的。

依：你厉害，你自己上的火车吗？

李：我就一边走，一边问。村里也有伴，一个联系一个，就跑了。也没有说出来找人（找男人），就说出来混吃的。

依：甘谷有火车站吗？你买票了吗？还是扒火车？

李：甘谷有个站。我没有买票！我哪里有个钱，哈，哈哈。有钱咱不出门。

依：人家不查你的票吗？

李：人家撵下来，咱可再上去。咱年纪小，被撵下来，再上去。

依：你被撵下来几次？

李：唉呀，我被撵上去，撵下来，撵上去，撵下来，多少次？谁知道？实际上，我还没有受多大周折，我的老汉（丈夫）在宝鸡把我遇到了，就把我领过来了。

依：你路上吃什么？

李：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依：你要过饭吗？

李：我没有要。有人要着吃，那不丢人。我到了宝鸡，把我的老汉给碰上了。他把我领回来的。

依：他那时候在干什么？

李：他在修铁路。

依：（我对李的丈夫说，他坐在轮椅上，听我们说话）你修铁路，就敢领回来一个媳妇？

陈：我在杨坪修铁路，打工哩。在宝鸡地方。

依：你下了火车，一个女子家，怎么和人说话呢？

李：我穿了一个烂棉衣，给点吃的，就跟上来了。

依：你那时候多大了？

陈：我那时二十三了。

依：那时候逃荒来的女子多吗？

陈：那多得很。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就在火车站转（转着找媳妇）。比如我是陕西人，我和一个女子说话，那人家查的人，把我发现以后，就让我给女子掏钱，把女子送回甘肃去。

依：谁给谁掏钱？我还不太懂。

李：让他给我掏钱买票，把我送回去。意思是不让你们打交道，不让谈什么。

依：意思是你们两个一说话，人家公家的人有发现，就让你买票送她回去？你怎么敢领媳妇，她没有户口？

陈：户口？那时要什么户口？

依：那你怎么挑？女子多了。你怎么挑？

李：哈哈，哈哈。

陈：那时候的情况，不说好看不好看，不说性格，就是男娃找女娃。就是那么个情况。

依：我姨长得好看哩。

李：好什么？

陈：给人都没有人要（老人开玩笑）。那时候我个子高，人精神。现在老了，缩了。

依：你一见就把姨领回来了？没有买点什么？

陈：到食堂吃了个饭。

依：吃的什么好吃的？

陈：那几年，还没有好吃的。就是你手里有点钱，比如甘肃人来咱陕西，没有陕西的粮票，还吃不上饭。陕西人到甘肃去，没有甘肃的粮票，也吃不上饭。

依：你把我姨来领到食堂吃了个饭，媳妇就找下了？花了有没有一块钱？

陈：那阵子是一块钱、五毛钱。

依：你就愿意跟上吗？

李：愿意嘛！只要领来有吃的。那是三九天气，冻得受不了。好坏跟上来，就有炕了，有地方睡了。我来的时候穿得单得很，冷的“啪啪”地哆嗦。天黑前把咱的命逃出来就行了。冷得很，三九天气嘛。

陈：甘肃人瓜的很（笨得很），我给你说。甘肃人来了，人家（政府）把甘肃人关了一房子，那时候是逃命哩，谁不想怎么样。甘肃人给人家看门哩。你如果把门一开，你跑了，让甘肃人都逃命去，不是好吗？不！不！甘肃人还把门看牢，不让人出去。那看门的人饿得问我要粮票，我说：“我有粮票，不给你们这样的人粮票。”

依：你说在宝鸡，关的甘肃人，看门的也是甘肃人，但是不开门？

陈：看门的、被看的都是甘肃人。就是甘肃人看甘肃人，甘肃人看住甘肃人嘛。你如果把门一开，都逃命去嘛。人家就不开，让人饿着冻着饿着。自己还问我要粮票，我有，我不给。

依：你说在宝鸡火车站，是不是去找媳妇的小伙子特别多？

陈：那多得很，和戏台子一样。妇女都是流窜哩，没有什么吃，你说怎么办？人家还说：“我出来要饭来了，把女子留在原上了，你跟上我去看一看。”

依：人家把你骗到原上去？

陈：把我骗到原上去，我拿了几个馍，给那人吃上。都是男人，甘肃来的，说他有个女子，说让我看去。把我骗到原上，就是宝鸡的坡上。不是男人出门没有人给吃的，我就给他吃了两个馍。说自己有女子给我介绍上当媳妇。

依：你去了有没有女子？

陈：没有。我去了一次，看没有那么回事。

依：骗你的钱了没有？

陈：没有。咱凭咱的良心，看人家可怜，给人家吃个馍。那是两个老汉，也没有抢咱的。不是人不好，是人饿得不行。那个年景不好，都不奇怪。也有抢的吃的，你买点什么，就抢着吃，把馍一抢就跑了……人都饿的，可怜，没有办法了。出了门了，到陕西也可怜。那一年，国家把这些妇女往回去送，不让留在咱陕西。甘肃也不让过来，嫌丢人，陕西不让留，吃粮哩。

依：那时候政府有没有让你回去？

李：让回去哩，我不愿意回去。我的大女子今年都五十了，这都多少年了？

依：政府让你回去，你都有老汉有娃了？

李：那人家不说，遣返妇女，都让回去，都让回甘肃去。

依：是政府派车送你回去吗？出路费吗？

陈：那是国家出，国家让你回去哩。人家不管你有娃了，有老汉了。我们这里就有女子给送回去了。送回去，她又跑回来了。

依：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

李：我的女子才六个月大，还吃奶着哩。我回去没有领娃。

陈：她离不开老汉！（老人很幽默）

依：你还那么值钱（开老人玩笑）。你哭了没有？婆娘要走了。你哭了没有？

陈：我？我还哭，我还找大队的人去打架。我还哭哩？我？

依：你打人了没有？

陈：送她的那一天，我就说：“她要跟着我，不愿意回去，谁要送她回去，我就找大队干部打架去。我就豁出去了，不管死活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哩。如果她自己说回去，那我说：“你要回去，你就回去，把我的娃给我留下。我要我的女子。”

李：哈，哈哈哈。（听丈夫这么说，李哈哈大笑，笑中有泪）

依：你的意思是，她不愿意回，你就去打架。如果她自己要回，就滚蛋，把娃给你留下，这就是你的态度？

陈：就是。我就是看她的态度。那我不打她。人家跟不跟你，要人家自愿哩，硬强求就不行。

依：你把她命救下了，有了娃了，你让她走吗？

陈：人家要走，就让人家走。

依：你最后打人了没有？

陈：没有，吓吓人。她要说不走，我就不打了。非要她走，我就去打。咱年青，不服气人。

李：我回去了三个月，他去找我去了。还没有找到我，但是我的娃娃在这里，我就心慌得很，想娃，妈想娃，就像天爷下雨一样，不由人嘛。我就跑回来了。

依：你回来队上不说你吗？

李：不说，咱自己吃自己的粮。政策过去就过去了，风刮一下就过去了，队上也就不管了。人哄人哩，政策来了，干部就管，过去就过去了。几万人回去了，政策嘛。

依：你们这个和戏一样，能拍个电影。

李：我这人泼辣，不是一点点。

依：你们两个打架吗？

李：成天都打哩，铁碰铁。我三个娃了，一个女娃，二个男娃。我这人热闹，人都爱我，走到哪里都热闹。其实我心里不舒服，家里有些事情，但是我眼泪一擦，脸就变了，邻居看不出来。以前我眼泪多得很，你哭，谁听哩？笑一笑，十年少。心情不好，也得过活……

依：你们这是一个馍，换了一个媳妇。合算着呢。现在十万都娶不上个媳妇。

李：你看，我来了，给他生了儿子、女子。一个馍一个媳妇，就跟上人家一辈子。那个时候还能怎么样？我们两个年龄差不多，算好着哩。

**后记：**在疙瘩头村，我还看望了一个叫秀兰的妇女，她今年六十五岁了。当年她的母亲带领着她们四个姊妹和一个弟弟逃荒到陕西，因为没有办法，就把最小的妹妹送人抚养。秀兰不愿意回忆以前的事情，我问什么，她都说：“咱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没有访谈成，但是我还是要写下她的名字。姓什么忘记问了，但是记得她所嫁的丈夫叫陈宝杰。秀兰一家就有六个逃荒者。

以下是我和秀兰丈夫的姐姐的一段对话，录于此：

依：甘肃的人就能留下吗？

无名妇女：她们是要饭过来的，咱这里那几年搭的大灶，就在灶上吃饭。没有媳妇的，就留下给当媳妇。

依：这里的人就要甘肃人吗？

无名妇女：要哩，有的人年纪大，不好找，就留下，给人家当个媳妇，不花钱嘛。这个秀兰是我兄弟媳妇。她妈来还要了几个娃，跟了街道上一个人，就不能留下那么多，就把那个小女子给人家了。■

【评论】

## 战犯刘峙妻弟黄兆楠的右派档案

莽东鸿

在旧书摊上，笔者偶然买到一部被废弃的人事档案。档案共210页，约15万字。卷宗的斑驳污迹和因水浸造成的一些字迹的消失，反映这部旧卷宗经历了多年人生风雨的洗涤。从卷宗封面印有“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认真搞好斗、批、改”来看，它是在“文革”时期装订的。

这部档案反映了社会基层一个右派分子的痛苦和企望；反映了一个原本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勇于提意见、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最后被“改造”成自污“党和人民的罪人”、视海外亲人为“我的敌人”的人。尽管努力改造了七年多，终于得到好评的这个身为“反属”、有海外关系的右派，摘帽仍然遥遥无期。

### 一、档案概况

这是一个名叫黄兆楠的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是吉林省辽源矿务局。档案内包



括1957年政工部门将黄定为右派的材料，1962年至1964年间他的“现时表现”和鉴定的材料，共9份。没有摘帽方面的纪录。其他为黄本人书写的材料：4份“入党申请书”（1953年10月25日至1954年9月30日），20余份“向党汇报”即“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改造规划”以及“保

（黄兆楠的档案）证书”等（1963年至1965年）。

从档案来看，黄兆楠原籍江西吉安，1927年生，本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伪官吏，加入过三青团。少年时代生活艰难，上中学的学费靠资本家姑父施舍。抗战时期在四川一家兵工厂艺徒学校半工半读，1941年和富有的大姐取得了联系，才上了高中和大学。四五十年代先后就学于辅仁大学、南京大学。1951年7

月于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分配于吉林省辽源矿务局的干部学校（下简称干校）任文化教员。1955年肃反运动被审查，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

1957年鸣放期间，黄兆楠对矿务局和干校领导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运动提出了意见。1958年5月15日，经矿务局党委定为四类右派分子，被撤职并降薪三级（月薪由68.5元降至45元），劳动改造。1962年1月从市农场调回，先后被分配在平岗矿的建材厂、选煤厂和生产学习中队劳动改造。

看来是由于黄的右派问题，1958年冬妻子与他离婚，带独生子去了黑龙江省。体弱多病的黄兆楠，自此孑然一身，过着孤独的生活。

黄兆楠有“海外关系”，还属于“反属”。

他的母亲、大姐、二哥、三哥、二姐，在美国居住，此时与他没有通讯联系。

他的大姐夫二姐夫当时均在台湾任要职。

大姐夫刘峙，为1949年中共宣布的第25号战犯，国军上将，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赴台后先后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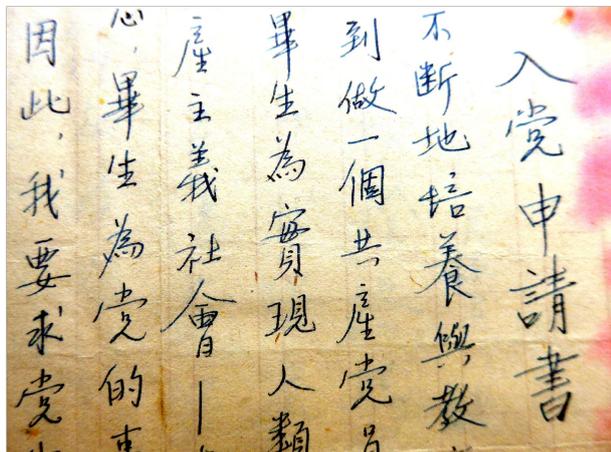
二姐夫刘子清，为国军中将，曾任第四十四军政治部主任，江西省保安副司令，赴台后，先后任“国防部”参议、凤山军校政治部主任、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

## 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

解放后，黄兆楠就积极靠近共产党，50年代初期多次要求入党。

1953年10月25日他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此后两年，（黄兆楠1954年9月30日的“入党申请书”片段）又先后写了《决心书》（1954年除夕），《迎接党的生日向党提出保证》（1954年7月1日），《伟大的国庆日向党宣誓》（1954年9月30日）。

在1953年的《入党申请书》中，他工工整整地写道：“在党不断地培养与教育下，通过‘思想改造’，我认识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光荣的，因为共产党员毕生为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事业——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到底。我有信心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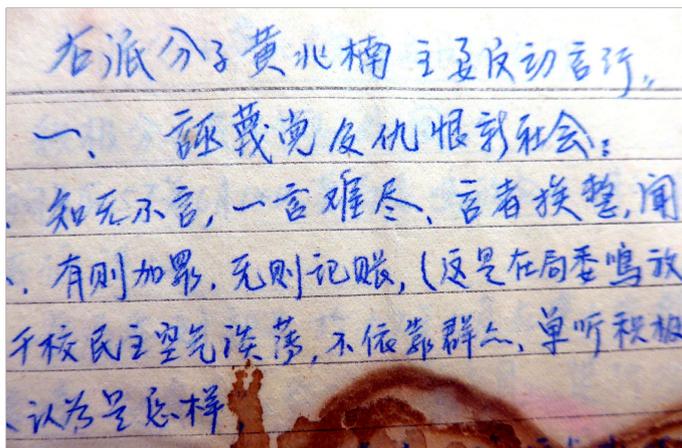
决心，毕生为党的事业奋斗，即或是牺牲自己。因此，我要求党审查我，考验我，吸收我做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4年国庆节前夕，他“向党宣誓”：“我要用毕生实际行动，实现我毕生意愿，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就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后，黄还将他“改造汇报”材料的名称，写为“向党汇报”，在交给人事科的同时，还将复写件交给党支部一份；每份汇报材料，抬头写的都是：“亲爱的党”，可谓“赤胆忠心”。

组织上一份关于黄过去表现的材料，也认为黄“运动前一贯表现积极，要求入党，并经常将自己工作思想情况汇报给组织。”

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怎么不到四年，就成了右派？他究竟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呢？

### 三、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组织方面的材料，主要有《黄兆楠的特点及顾虑与运动中的表现》，《右派分子黄兆楠鉴定》（1962年9月2日），《右派分子黄兆楠政治鉴定》（1962年11月7日），《黄兆楠1963年12月29日 在年终会上

（《右派分子黄兆楠主要反动言行》片段，1964年7月13日）的发言记录及评语》，《右派分子黄兆楠主要反动言行》（1964年7月13日），《关于黄兆楠的现时表现》（1964年7月15日），《右派分子黄兆楠登记表》（1964年7月19日），和未标明年代的《右派分子黄兆楠的思想动态》、《右派分子黄兆楠的反动思想和工作现象的表现》，以及工段长岳××写的《对黄兆楠工作表现的鉴定》（1964年1月24日）等10份。

《右派分子黄兆楠主要反动言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黄的“右派罪行”。全文如下。

### 一、污蔑党及仇恨新社会

1. 知无不言，一言难尽，言者挨整，闻者记账。知不敢言，一言难尽，有则加罪，无则记账。注（原注，下同——编者）：这是在局委鸣放会上他讲的。原话的前言是：干校民主空气淡薄，不依靠群众，单听积极分子汇报。因此他说有些人认为是怎样。

2. “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这点我体验的很深刻。

注：大鸣大放期间他见到光明日报上有的右派分子讲这样一句话，自言自语讲的。当别人问他时说，因为亲友现在都不来信了，意思说新社会冷酷无情。

### 二、攻击党的方针政策

1. 学校肃反是宁左勿右，拿好人当反革命。不让我结婚是违反婚姻法。

注：于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党局委鸣放(会)讲的。

2. 你问他（指原干校校长赵志高）知道洪秀全是怎样失败的不？

注：五七年六月于黄××家和郑××讲，说干校在肃反时给（把）他整了。

3. 干校对知识分子利用、限制，党团员特别吃香，对干部使用、提拔犯严重的宗派主义，党团员提拔培养，群众变相降级，思想改造是整人，这样作法不如旧社会。

注：这些话是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党局委召开鸣放会上说的，最后一句是在小组斗争会上说的。

### 三、丑化党团员和知识分子

1. 干校领导不懂业务，有个小集团，小集团还有个核，核很硬，一定要给敲碎。干校领导不走群众路线，单靠积极分子汇报，积极分子是刺鬼，外围。

注：前两句是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党局委鸣放会上讲的，后一句是在七月间和同志们讲的。

2. 党局委刘部长于五七年五月作关于审干总结报告时，他写匿名条子，提出意见，进行攻击。意见内容如下：

(1)对觉悟低、没有提拔的干部闹情绪，进行批评，是对的。这一部分是多数还是少数。

(2)被提拔干部有30%是业务（人员），觉悟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

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造成的，客观引起了一些意见是否奇怪。

(3)不合理的提拔，是否“可能有”吗？不是肯定有吗，没有发现吧。

(4)听您报告的人，似乎都成了您教训的对象，最好是区别明确一下是多数还是少数。

(5)干部政策的优点和缺点。希望从主观和客观两面分析一下。

注：当时正处于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右派嚣张时期，显然他是攻击。

这些言论，就能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吗？不过是对矿务局及干部学校的领导，在执行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和肃反工作方面，提些意见和发点牢骚罢了。

那个时候党中央宣布的政策是动员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组织的态度应该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对反右的解释是：“引蛇出洞”，“阳谋”。郭沫若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反右的时候，黄的态度，组织的记载是：“装作镇静，手段狡猾”，“一当组织揭发就痛苦流涕”，“在最后揭发其现实活动时，表现很害怕，表示他算完了”。

### 三、黄的思想改造情况

1958至1965年七年多改造期间，黄兆楠的思想情况如何呢？

就思想汇报来看，黄兆楠是“认罪服法”的，积极而努力地“改造”自己，以“早日摘去可耻的右派帽子”（引自黄的汇报材料，下同）。

他积极汇报自己的思想改造情况，1957年反右以后至1961年在市农场劳动期间，写“改造日记”交组织审查。此后经常写思想汇报，1963年每月一份，1964年二季度以后每季一份；年初有改造规划，年底有改造总结；里面还有许多专题的汇报，如《考验与改造》《听党的话，谦逊学习，不臭不硬》《要真改造，不要假改造》《时间的考验》，以及《划清阶级界限》《应该艰苦一些、再艰苦一些》等等。

在思想汇报中，他不断地解剖自己，检讨自己，并吐露他的喜悦、痛苦和愿

望，以及对国内外大事的认识——汇报中有大量关于国内外大事的感受，如对于1962年蒋帮侵犯大陆一事，他在《1963年改造总结》中写道：“在蒋帮叫嚣企图登陆窜扰时，(我)坚信在党英明领导下，全国军民有力量将它们彻底消灭干净，更加强了对反动派的仇恨。”

黄对自己的“右派罪行”进行过多次批判，上纲上线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说自己“猖狂向党进攻”，“企图断送革命”，“恩将仇报”，“认清了自己过去反党反人民的丑恶面目，和修正主义是同流合污，异曲同工”。

其中系统而全面的一次自我批判，是他1963年1月写的《彻底认罪，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划清界限！永远跟着党走！》。他写道：

……我污蔑干校肃反“过左”了，是“宁左勿右”。从事实上看，干校的肃反并未冤枉一个好人，结论都是正确的，在肃反当中也从未打骂过一个人。我说“过左”了，也就是说肃反这种激烈斗争是过火了。干校党总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肃反方针政策，我说是“过左”了，“过火”了，这和修正主义者在今天扬言可以取消阶级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又有什么两样呢？……我污蔑干校肃反“过左”了，不是取消阶级斗争的翻版么？我是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很明显么？

我说干校只提拔党团员，群众则变相降级，听来似乎是为群众抱屈，为自己抱屈，实质起到了煽动群众反对党，取消党的领导的作用。党团员是群众里面的一员，是有觉悟的群众，与群众水乳交融，在群众中起到先进、带头作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难道提拔有觉悟的、先进的人，让他们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多负一些责任是不好的事么？……很明显，我的这些谬论是向党和人民进攻的语言炮弹，是为人民的敌人所欢迎的。

我写条子质询刘部长的报告，没有把产生不合理的提拔的主客观原因说明，我是在发泄干校没有提拔我的怨气，把我这个“人才”埋没了，……像我这样的观点、立场的人，什么人会欢迎我能爬上去呢？人民是不欢迎的。

我的主要谬论的实质……和今天修正主义者铁托叛徒集团的主要反动论点不谋而合。修正主义者铁托叛徒集团希望大家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时了，可以不通过革命，不通过阶级斗争，不通过夺取政权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要人

们相信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会变的。我说肃反“过左”了，“过火”了，和不要阶级斗争有什么两样呢？我希望群众中落后的也能受到提拔，这和铁托叛徒集团扬言让工会群众组织来代替党的领导有什么两样呢？我说人事工作没做好，搞糟了，这和铁托集团骂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集团，内部应该改组又有什么两样？

黄一心一意要改造为新人。汇报中，黄经常表达他成为右派的痛苦，和盼望早日摘帽的急迫心情。其他右派陆续摘帽，他的心情更加着急，他“希望像特赦一样能摘掉右派帽子吧。甚至计划一旦摘了帽子，怎么去接儿子回来，怎样安排他进保育院，可能的话找个对象，成家……。”他十分懊悔过去：“由于我过去的错误立场、观点、思想，使我在1957年犯了不能弥补的错误，……这几年来来的改造中，经常自食一切药里最苦的药——‘后悔药’。”

黄兆楠迫切地希望得到组织的教导，多次呼吁：“希望党多谈话、多教育”，“帮助我在今后的改造中更加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然而，看来组织极少找他谈思想改造方面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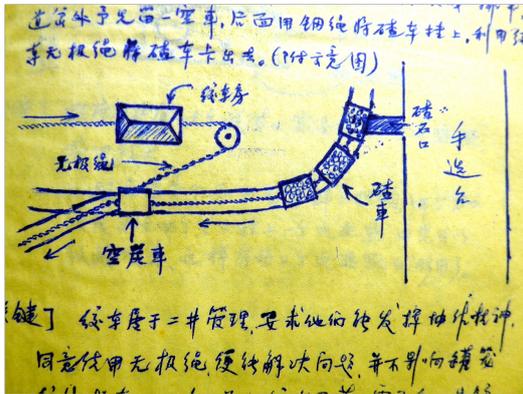
尽管如此，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同时对于周围的存在不良现象如赌博等，也能够提出意见。他的劳动成绩经常被评为“五好”“四好”，他还建议领导对“五好评比”的庸俗化弊病予以纠正：“我认为在选煤厂评的‘五好’水平很低，只要上了满班，没和人闹意见，干活一般，学习没迟到，就保险是‘五好’，这怎么能行呢？这里面问题很多……”

#### 四、黄的劳动改造情况

黄兆楠带病努力劳动，并多次提出技术革新建议。早在参加工作的初期，黄就患有相当严重的胃病、十二指肠溃疡，曾被安排在苏联专家餐厅吃西餐。打成右派以后，劳动改造期间，经过医院鉴定和批准，他曾经多次住院治疗。尽管医生多次告诫他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但他在每次病休一两个月以后，又尽可能参加体力劳动。1963年6月的一次劳动中，黄不慎摔倒，鼻骨和脸部受伤，眼睛也睁不开了，治疗了几天，不顾医生劝阻，继续上班劳动。

下面是黄汇报中的几个片段：

这个月因病未愈，继续休治，中旬曾征询医生意见，愿边治病连做点活，医生知道我是力工以后，认为不行，未同意。和工资科的池同志谈过，让我病好了上班再安排工作。我已经休治两个月零十天了，长此下去，真是令人焦急！干拿工资，成了废物。(1963年2月27日)



(黄兆楠绘图的一项技术革新建议)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选矸当中，我同样不服输，我不是不服女工，我较量的对象是矸子，我要消灭它们，要像那些快手女工一样，既快且准，又稳又狠。……拣呀，拣呀，一个礼拜左右，我的速度快多了，能左右开弓，像女工一样了，……同样，平车、推碴子我没有落在后面。我是高兴的，因为我是有意识地在克服一些困难，而且战胜了它们……(1963年4月)

尽管如此，多病的他，内心是痛苦的：

我在劳动的行列里是一个弱者。体质本来不好，又瘦又小，从来没到过九十五斤体重，另外又加上有病，弄得“弱不禁风”，娇滴滴地，干起体力活来连个“老娘们”也赶不上。……六年来的劳动改造，劳动本身并没把我难倒，没病的时候，我什么都干过，也没害怕过。可在体力劳动面前，让这个鬼病把我难住了，不得不做最轻的、最简单的劳动——选矸。要不是“病”，我做点重活，贡献更能大一些，是多么高兴啊！(1963年4月)

黄不仅努力做好本职劳动，同时钻研技术、关心班组工作。他多次提出技术

革新建议：1963年提出在平车煤仓下安装一个半自动的刮板，得到了选煤厂党政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他制作了装车划线手册，经支部书记审核后，发给各班的应用，黄“因此有十来天的业余时间没有得到休息，但心情是愉快的。”还向厂领导提出附有设计图的三项技术改革建议。他还多次提出一些关于工人加强文化、技术学习与技术考试的建议，他写道：“我们的班组长都不会算术，百分比、立方米、比重等等都不会计算，组员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如果本身不明确质量指标，那就心中无数，糊里糊涂了。希望上级能为我们厂制订学习计划，包括技术学习在内。”

## 五、党组织对他的评价

从组织鉴定来看，1962年书写的几份评价都不好，1964年下半年以后，评价较好。

1962年9月2日署名建材厂党支部的《右派分子黄兆楠鉴定》，其中写道：

### 一、在工作方面的表现

(一)……由厂里分配工作时，首先挑轻躲重。叫他到车间搞工人工作，该人说搞工人工作够呛，还是搞过去那样工作还行。厂里领导给他谈了工作问题：根据你的体格，给你找适当的工作。再没提出其他意见，从事了工人工作。

(二)当从事工人工作以后，(他)就提出意见，说我挺大一个老爷们，还没挣过老娘们，真是不好说。为此在工作上，就东走西看，放弃了工作，重视了报纸。一看送报纸的来了，不管在什么时候送来，放下工作去看报纸。当原来的工作停止啦，又分配他其他工作，不说不去，但是只做一天两天，就提出自己干不了，病够呛。为抵制工作，说我请一天假吧。当没给假时，就去医院看病，看私伤。

(三)现在又提出了要求工作，(说)我看筛沙子那个工作不错，是否领导能答应我，叫我去筛沙子去，另一个(问题)也应该把我的工种定下来。

(四)(他说)关于我病的问题，咱们这医院看不透，没有治我的病药，只有我从天津带来的药。医生叫我吃我自己的药，叫我休息。这一点，他去看病，医生没有批，叫他休息，以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去看病就批了，给时间休息，以此

掩盖消极怠工。

## 二、政治思想表现

1. 该人在政治思想上，有对党不满情绪，曾说我现在十几年的文化没用了，我也没有什么前途了，破罐破摔。

2. (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决定我下放到农村，让我个人找地点落户，办理落户手续，并给我假。可我请假走后，途中病啦，就延了假期时间，可是回来扣我工资和粮票，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3. 工资粮票发给的同时，干部科指示，叫本人写书面材料，当厂子叫他写书面材料时，本人说，这个材料我不能写。当领导问他为什么不能写，该人说写了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主要是为了工资问题)。上述是他对党不满的具体表现。

4. 当蒋介石窜犯我国沿海大陆时，刘书记找他谈话，说你应该加强学习。他说，我不用学习，我早就知道了。

5. 该人在当记录员时，对于工作也不认真。每天在记也是马马虎虎。就是依靠工人自己报的数字来记，也就是粗枝大叶而已。

6. 该人兄弟于本年8月26日从天津来信说，我哥哥请假为什么不给开工资？谁给你们规定的？……

上述情况属实，但无有优点，谈到该人优点只是□□(按：字迹不清，下同)化，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优点。希领导对该人实际表现情况加以分析。

同年11月7日煤矿党委写的《对右派分子黄兆楠的政治鉴定》，全文是：

右派分子黄兆楠，在改造中表现是不老实，口服心不服，对党不满，未有悔改之意，口是心非，表现很坏，工作中抱有拿轻躲重、破罐破摔的态度。

该人在四年来的劳动改造和党的长期教育下，没有很好的改造。虽然向组织写思想汇报情况，但没有认罪的表现，在思想行动上表现不老实，如1962年6月13日蒋匪帮妄想窜犯我东南沿海大陆消息后，组织找其谈话，叫其参加学习时，而该人□□不学习，反而说“我不用学啦，我早就知道了。”又如，该人去天津回家，超过假期回来，领导找其写书面材料，而又不但不虚心接受，反而说这个材料我没法写，写出来也不能解决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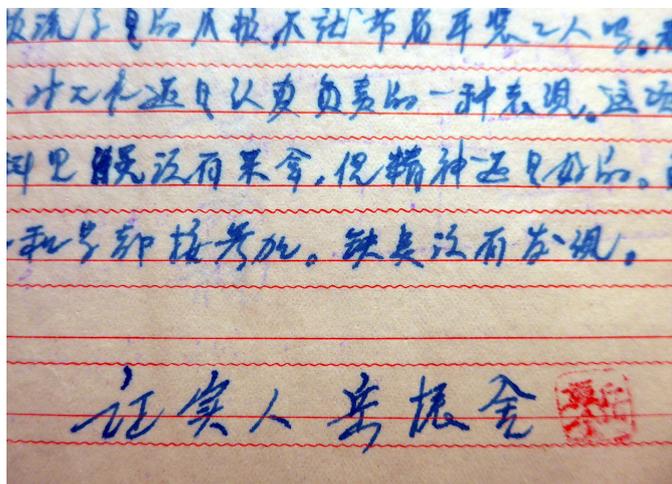
□□□□□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敷衍了事，坐在办公室，只听工人报的数字，而不实际深入现场，不服从领导分配，不安心工作，闹工资，讲待遇。由于该人在改造中表现不好，在做现场记录员期间，工作不负责任，在精简干部中，领导找其谈话，叫当工人，参加劳动，而该人表示不满说，当工人真够受，不如原先当现场记录员。并借口工作干不了，经常泡私伤，跑医院，以有病为名，消极怠工，并宣扬说他的病矿医院治不好，以此借口休息。在各项运动中没有什么突出表现。

根据以上现实问题，该人在改造中是不接受改造的。

1963年12月29日煤矿在“黄兆楠在年终会上的发言记录及评语”写道：“该人在工作中因身体患病有时不能坚持工作，工作一般，向组织汇报比较及时，在这次交心会上，表现一般，但接触思想还是有距离的，几年没改造好的原因谈的不多，在会上能向他提出意见。”

1964年4月16日《右派分子登记表》的“单位意见”栏，写的是：“现时表现一般。”此后突然有了很大改变。（段长的鉴定：“缺点没有发现”）

7月15日的《关于黄兆楠的现时表现》写道：“该人工作积极肯干，在运动中按时参加，发言积极，思想要求进步。利用业余和休息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



7月19日《右派分子登记表》的“审查意见”栏，写的是：

“表现较好。”上面盖的是“中国共产党××矿务局委员会肃反清理办公室”的公章。

黄兆楠劳动所在工段的段长岳振金，应该对黄最了解了，他1964年1月24日书写的对黄评价，全文如下：

黄兆楠：工作表现很好。如在选煤厂，本人有溃疡病，医院批15天私伤，

结果只休2天就上班了。上班那天，段长岳××同志问，你私伤没到期，你上班能行吗？黄说，段长，我这个病10天半个月没有什么效果，上班吧。以往工作情况都很积极，工作还是任劳任怨的。每天上班来，不说东不倒西的工作，没有其它的坏表现。另外在工作当中很动脑筋，有一次他看到漏斗漏在车里一堆一堆的煤，还得用平装工人，他向岳段长提出合理化建议，今后应当改一个像爪板流子，不就节省平装工人了吗？看起来这个人对工作还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这项合理建议，科里没有采纳，但精神还是好的。再一个是工作和学习都参加。缺点没有发现。

## 六、为什么没有摘帽

从黄兆楠的劳动改造、思想汇报以及1964年组织和基层工人对黄改造情况的评价，总的来说是好的。那么，为什么戴帽7年多直到1965年初还没有给黄摘帽呢？

这恐怕就要从那个时代同“政治生命”紧密相关的个人成分、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方面来分析了。

黄的成分是学生，这没有什么不好；曾是三青团员，这通常被认为是“历史污点”，但他早就交待清楚了，肃反结论也认为是“一般历史问题”。

关键的问题，恐怕就在于他是战犯刘峙的内弟！

刘峙何许人也？“国军”上将，内战时期担任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徐州“剿匪”总司令。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提到过他的大名。刘峙后来在台湾任“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他的二姐夫刘子清是刘峙部下的将军，在台湾也曾任要职。何况他的许多亲属又居住在“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国家，海外关系问题何其“严重”！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迟迟没有给黄摘帽：给战犯和台湾要人的内弟摘帽，当然要“慎之又慎”（尽管他表现甚好），千万不能因此犯政治错误。

看来黄兆楠也知此情由，他在“汇报”中，经常“为海外有亲属和社会关系而苦恼”。他在1963年2月27日《向党汇报》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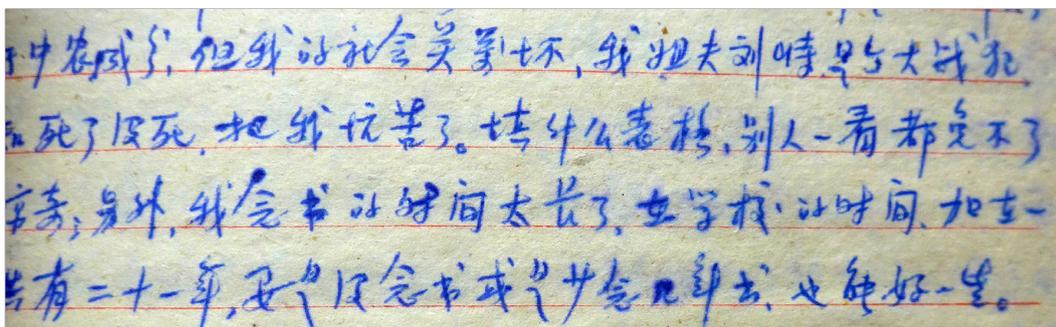
这五年多的改造中，我参加了平均每年约两次的摘帽子促进会。一九五九年

国庆那一次我正住矿务局医院治疗，看到报纸登载特赦战犯的消息，我想，战犯都得到了特赦，我这样的右派分子，错误“不算严重”，处分也比一般的轻（右派第四类，撤职降薪），别的多半是生活补助费，我还拿工资，大概劳动改造了壹年多时间也就差不多了。这次很有希望像特赦一样能摘掉右派帽子了吧。甚至计划一旦摘了帽子，怎么到鸡西去接儿子回来，怎样安排他进保育院，可能的话找个对象，成家……。想想很美，可就是把自己是否改造好了，是否符合三项标准给扔到一边了，想得很少。

以后哪一次摘帽子也没有我。头几次我想，凡是出身成分好，表现不大离的，都能先摘，我够呛。虽然我父亲生前是个小科员，相当于中农成分，但我的社会关系坏，我姐夫刘峙是个大战犯，也不知死了没死，把我坑苦了。填什么表格，别人一看都免不了感到惊奇；另外，我念书的时间太长了，在学校的时间，加在一起一共有二十一年，要是没念书或是少念几年书，也能好一些。

实际怎样呢？以后的几次摘帽子促进会证明，我那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其中既有知识分子，念很多年书而同时又是地主或富农成分的，同样摘了帽子。

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明白过来了。只要符合了三项标准，谁都一样能摘掉帽子。相反，出身成分好，没有文化，如果不符合标准，也同样不能摘掉帽子。亲见的实例不少。这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改造的政策和三项标准是不会变的，等待、幻想、机会主义，这些东西趁早清除。必须以“变”来应“不变”（改造政策和三项标准）。政策标准不会变，要变的是自己的立场、观点，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来说明。



（黄兆楠 1963年2月27日《向党汇报》中的说：“我姐夫刘峙是个大战犯，……把我坑苦了。”）

1964年底，他在《划清阶级界限，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结合当前阶级教育和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后的个人认识》一文，全面分析和批判了他

那个复杂的家族包括各个人和他自己。文中写道：

两个姐夫，都是反动派头子，刘峙带着他的花岗岩头脑进了棺材(编者按：实际上刘峙当时未死，1971年才病逝于台湾)，二姐夫刘子清据省委下来的张同志告诉我(1957年秋经局委，指示我配合和平解放台湾，给亲属写信时)，还是台湾的一个反革命头目。

仍在海外的我的亲属，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人民的罪人，当然也是我的敌人。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观点没有得到改造，发展到一九五七年，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了反动派的代言人，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急先锋，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

因此，黄兆楠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我要和这个旧黄兆楠划清阶级界限，并且经常不断地和他进行斗争，拿这个忘恩负义的旧黄兆楠做为我的子孙后代的反面教材！

综上所述，黄兆楠本来是个积极上进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在鸣放中给单位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就在“阶级斗争”大棒的无情打击下，沦为“阶级敌人”，此后被撤职降薪、妻离子散，带病在监视下长年从事他难以胜任的体力劳动。在左的路线强力压迫下，他的一些原本正确的思想也被扭曲。尽管黄兆楠努力改造自己，可是，看来正是由于有严重的“反属”及海外关系，使得他那顶沉重的右派帽子，迟迟不能摘掉。

1965年年初，“四清”运动正在全国逐步展开，新的一场阶级斗争的锣鼓越敲越响。如果到了1966年上半年还没有摘帽，头顶右派分子帽子、身负“战犯内弟”“海外关系”沉重包袱而又体弱多病的黄兆楠，还能经受住“文革”风暴的摧残吗？

从包括入党申请书在内的档案被人事部门抛弃的现象分析，不免令笔者对他的命运产生一种凶多吉少的担忧。如果黄兆楠能够幸运地浩劫余生，现今该是近九十的老人，也早和海外亲人取得联系甚至同在黑龙江的妻儿“破镜重圆”了。若能如此，祝黄先生安康、幸福。■

【随笔】

## “革命”的用法

——“红色话语”小议之五

启之

如果评选毛泽东时代的十大关键词，“革命”肯定会排在第一。如果把评选的时间向前延伸一百年，相信“革命”仍会入选。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是这百年中用得最多，传播最广，内涵最丰富，最富于变化，也最攸关生死的词，它不入选，谁入选？

可是，语言学家——不管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对这个至关重要的词似乎都没有深究过。因此，生在革命中，长在革命下，深受革命“恩泽”的我，要不自量力地说一说“革命”这个词。

革命是个多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给它列了三个义项：（1）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的发展。（2）具有革命意识的。例：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3）根本改革。例：思想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修订本，1996）其实，在人们平常的理解中，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杀人放火，就是暴力夺权。韩寒的《谈革命》<sup>1</sup>中的革命就是这个意思。

看了词典的解释，学问家会勃然大怒：这是什么词典，怎么不提“汤武革命”？真真岂有此理！这位老兄有所不知，“革命者，整个儿地推翻旧制度旧秩序旧世界，建立新制度新秩序新世界之谓也。榜样很辉煌地摆在眼前：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再后来，俄国十月革命。”此革命“决非原先‘汤武革命’里改朝换代的意思（否则，《封神演义》岂不成了头一部‘革命历史小说’）。”<sup>2</sup>

词典上说的只是革命的词汇意义。按语言学的说法，词义不但包括词汇意义，还包括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据我看，革命的语法意义也很有些革命的味道。你看，它简直是一个全面手，既是名词和代词，在句子中充当主语；又可以居动词

<sup>1</sup> 《周末文刊》，2012年，第23期。

<sup>2</sup>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之位，在句子中做谓语；同时，它还是一个曾经泛滥成灾的形容词，在句子中做定语来限定名词或代词；另外，它还常常以状语的身份出山，把谓语修理一番。可以说，在语法上，革命简直就是一个巨无霸。

词汇的色彩意义指的是它包含的感情和感觉——褒贬、冷暖、亲疏、庄谐。在这方面，革命即使算不上巨无霸，也属于神通广大的巨灵神、雷震子一类。三十年前，它居褒义词的顶端。新时期以来，它似乎又带上了贬义。有时，它温暖如春；有时，它寒冷彻骨。有时，它像你的亲人；有时，它又成了众生的陌路。它曾经庄严肃穆，令人仰止行止，可即使在“告别”之前，它就带上了嘲讽的韵味。而在“告别”之后，它更成了口头笔端的戏谑。

总之，革命一词，可道者多矣，兹择允许言说者，略道一二。

## 一、革命作为形容词

革命作为形容词，在文革期间用得最多。请看下面这句话：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个句子摘自1967年10月1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两报一刊”主宰了中国近十年，其社论代表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志，权威性不言而喻。这个句子出现在这个社论中，说明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表述。

这个句子共53个字，其中有七个名词——“红卫兵”、“学生组织”、“大联合”、“群众组织”等，共计21个字。有六个形容词——“革命的”，共计18个字。剩下的是动词连词介词。作为修饰名词的“革命的”几乎占了全句的三分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如果抽去这18个字，这句话就成了这个样子——

红卫兵和学生组织要实现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群众组织，就要在原则下实现大联合。

从语法上讲，没有这六个“革命的”，这句话也讲得通。从作文上讲，加上这六个定语，这句话就变得累赘啰嗦，似乎成了绕口令。

“革命的”大量地用于定语，意味着很多名词——红卫兵、学生、联合、群众、组织等表达的事物，第一，已经分成了性质不同的种类：革命的、不革命的、假革命的、反革命的；第二，这些种类又混在一起，难以分辨；第三；这些事物与革命的关系随时都在变化——昨天在台上做报告“干部”，今天可能就成了走资派。今天还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组织，明天就成了反革命集团。在此危难之际，不请出“革命的”来限制它们，那革命还搞得成吗？

“一切名词都是现实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sup>1</sup>一个名词一旦需要用“革命的”来限制，就意味着它代表的事物本身失去了原有的规定性。林彪对此深有体会：“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sup>2</sup>林副统帅搞不清楚，正统帅同样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只好在文字上做些许改良——用“革命的”来限制那些名词。

语言是文化现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连这一现象的区区小命都革不了，而只能做如此笨拙的点滴改良，实在令人沮丧。好在当时的革命者对这个改良品欣然接受——他们相信只要在学生、组织、同志、群众等等名词前面加上“革命的”这个定语，是否革命与真假革命就会大白于天下。

按照陈原的说法，这是革命的“语言的灵物崇拜”。<sup>3</sup>它跟善男信女念叨“阿门”、“阿弥托佛”一个道理。跟《红楼梦》中的马道婆给凤姐、宝玉施“魔法”——将年庚八字写在纸人身上，用蓝纸铰的五个青面鬼拿针钉在一起，是同一种思维方式。这时候的“革命的”成了神汉念的咒语，巫覡画的符箓。而到了这个地步，语言就“不再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是思想本身。语言不是‘载体’，而是有神力的思想。”<sup>4</sup>

<sup>1</sup> 陈原：《社会语言学》页 52，北京，商务，2004。

<sup>2</sup>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sup>3</sup> 《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页 46，北京，三联，1980。

<sup>4</sup> 陈原：《社会语言学》页 349，北京，商务，2004。

## 二、革命作为代词

七十年代初，阎连科还是个农村的小青年。有一天，他正在同生产队的老社员在田地翻红薯秧子——

不知为何，竟有两辆上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在了红薯秧的垄沟。起来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于是，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儿事啦？！”<sup>1</sup>

这段文字中，革命有三种语法功能，（1）名词（革命者），（2）动词（你们革命），（3）代词（对着革命的背影）。前两种司空见惯，不必多说。值得一说的是代词。生产队长“对着革命的背影”大骂。这里的“革命”，指代的是前面提到的“革命者”。

为什么不直接说“对着革命者的背影”大骂，而偏要用“革命”指代“革命者”呢？这正是阎连科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只有指代，才能把时人对造反派，对文革，对世道的不满表达出来；也只有如此表达，才能透露出作者对“革命”的嘲讽。

## 三、革命作为状语

语言的“灵物崇拜”，又叫语言的“物神化”。“为革命……”就是这个“物神化”的一个重镇。“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写作”、“为革命锻炼身体”、“为革命学好外语”、“为革命苦练基本功”……这是毛泽东时代常见的说法。

到了邓小平时代，巴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疑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什么不提倡为革命吃好饭，睡好觉呢。<sup>2</sup>巴金忽略了，“为革命……”是目的状语，

<sup>1</sup>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七十年代》，页395。

<sup>2</sup> 《随感录》，页144。

它后面跟着的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事。种田，脸朝黄土背朝天，谁愿意？写作，就算是写党八股，也要费些脑筋；锻炼身体，需要吃苦、受累、意志坚强；学外语、练基本功也一样。一般情况下，吃饭、睡觉没有难度，所以用不着把革命搬出来。如果吃饭有了难度，且与“革命”有关，那么，解决吃饭的人就会被革了命。1959年，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为了挽救濒临饿死的五十万百姓，开仓放粮，被判了二十年。1960年，山西河曲县委书记刘毅，也因为擅放国库粮丢了官。

因为有难度，才需要抬出一个伟大庄严之目的，“为革命”云云，就像《西游记》里的神仙祭起的法宝。那法宝一旦高悬空中，凡人就只有匍匐在地，屏气息声，俯首听命。江青对她的护士、警卫、秘书说，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革命服务。这种服务包括陪她打扑克，为她养狗养猴，为她追捕蚊子，还包括被她辱骂：你给我滚！

为了逃离土地，摆脱当农民的命运，阎连科选择了当兵。“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根本，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sup>1</sup>

#### 四、革命成了调侃

在八零后的台湾人廖信忠那里，革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父母为了他能考上好高中，让他上初四班（升高中的补习班）。这种班实行封闭式管理，天天考试，考不到规定的分数，就由班导师进行体罚——差几分就打几下。

被打的同学很自觉地把手撑在桌上，班导师充满杀气地挥起木棒，不，是鼓励棒，然后拉弓，将满满的鼓励从屁股下方几寸的大腿肉上注入全身。只见被打的同学脸上一阵阵的扭曲，尤其是老师下手的那一瞬间，表情忽然变得非常狰狞，让后面的同学觉得更加恐惧。……班导师打人时用力之猛，一班六七十个学生打下来，一天总要耗损几根棒子，挨打的同学常常都被打到手掌及屁股都淤青变黑。……说也奇怪，大家

<sup>1</sup>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七十年代》，页411—412。

还是不懂得努力一点读书，避免挨打，反而研究起被打时怎么不痛，但后来我才晓得，一起研究这些事情是增加革命情感的好方法。<sup>1</sup>

这里的“革命情感”实际上是挨打引起的同命相怜的感情。作者为什么不用“受苦”、“患难”而偏要用“革命”呢？因为后者有趣，带有调侃的味道——现代的年轻人，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想戏谑一下曾几何时充斥两岸的“革命”。

## 五、革命的浑沌

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可是，“革命”却言人人殊。

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里的革命是中国的统一富强，是三民主义的全面实施。

蒋介石说，“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这里革命是“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

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里的革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全国全面内战和在腥风血雨中交班。

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里的革命是社会主义不姓穷，是市场经济，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革了半天命，到底什么是革命？

浑沌学使我对革命之人言之殊，有了浑沌性的理解：革命的义项之一，是“根本改革”。不管搞什么样的革命，不管根本不根本，改革总是吸引人的。因此，革命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含义。由于认识水平的提高，法国人用小写和复数的方法把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归结为“动乱”。<sup>2</sup>而中国人则用加引号的方法，把史无前例的文革归为“浩劫”和“折腾”。■

2012-5-19

<sup>1</sup> 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页140，重庆出版社，2011。

<sup>2</sup>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页138，浙江人民，1991。

【札记】

## 读萧军《延安日记》（七）

### ——一个巨大的挑战

胡庄子

《延安日记》中，可以说的话题还有很多。比如，萧军眼中的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萧军在延安文学创作的经络……。再说下去，就太长了。

有记者问《黄金时代》（以萧红为主角）的导演许鞍华：你对萧军是怎么看的，看过他的《延安日记》吗？许答：“我觉得《延安日记》很好笑，他对自己的厚望是可笑的。他写的时候希望自己是世界级的作家，非常努力。不停有读书计划，像个学生一样，要看苏联、世界的经济史，每天要写多少行诗歌，到延安去演讲；他跟毛泽东交往，以为毛泽东真的会跟他谈心。他还早晨跑到河边唱歌，希望把自己练成一个男高音。这种雄心比天还高。他觉得丁玲也喜欢他，觉得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可他绝对是一条汉子……”（《南方周末》2014年10月2日）

笔者以为，《延安日记》是中国日记中最具有价值的“十种日记”之一（如果要排前十名的话）。

萧军，一个文人，他在一个几乎是纯军人的环境中，看党人，看党员知识分子，看其他文人，看武人，都看不惯。

其实，党人、武人、农人看他也看不惯——人家说他，“拿身份，特殊化”（43-10-31）。“为什么延安那些文化人还能生存，而你却不能存在？”（44-1-19）

萧军是作家，因为有鲁迅的背景——他是鲁迅葬礼上的16位扶棺者之一，素以鲁迅学生自居，又有成名作，自信满满。他看自己之外的目光都是审视的。他的性格放荡不羁，又没有组织生活的经历和锻炼，容易与各方面产生冲突。他的思想既有中国的又有西方的，既有马列的也有其他如自由主义的，复杂甚至是不统一的。他才30多岁，有大志向，以为自己在政治、文学、治人上无所不能。其实，他不知道他在延安所面对的中共党人，都非等闲之辈，大都是久经沙场、出生入死、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许多人的文学素养也不比他差。这些决定了萧军与

中国共产党必然产生冲突。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是由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来自西方的其他的思想资源相当有限。中国共产党，有与工农兵、国民党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少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经验。况且，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工作，忙着打江山，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和文人身上。中共是个政治组织，其人员主要是从军队成长起来的，他们遵循“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决定了这个党与萧军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冲突。

萧军以一个文人的敏感（或者说神经过敏），以为自己不被共产党所理解所关心，认为党对他无礼、冷淡，甚至排斥。一些共产党人则认为，这个人在延安什么事也不干，享受中级干部待遇，养活着他，让他吃现成饭，他还到处借钱到处打架到处和女人联系，还对政治指手画脚，还是毛泽东的座上宾，凭什么……

萧军说：“革命对工农带来的是利益，是愉快，对于知识分子却是生活降低，不自由。”（43-5-24）“工农革命是有所得，知识分子革命却是要失掉他的一些东西——物质上和精神上——而且要以最大的努力战胜自己，战胜敌人，战胜可能的引诱，革命中的障碍物……工农革命是为了自己，知识分子革命却是为了心！”（43-10-20）这是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苦闷。

读《延安日记》，笔者强烈地感到：萧军当年在延安的一些思想观点，今天我们也没有超越；他担心的问题，今天许多已经成为现实；他对共产党人的批评意见，至今仍值得党人警惕和思考。

萧军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日记也许有一天自己把它发表，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我应该记得更忠实，更详细些。无论是卑丑的，光明的，自己的，别人的……党的，社会的……全要记载下来。（40-9-24）

萧军的延安日记，第一读者是他的夫人。当然她看的是部分内容。“整日芬在读我的日记，一刻哭，一刻笑，一刻感叹……这似乎深深感动了她。”（44-4-27）

延安日记的第二读者，是彭真，可能还包括毛泽东。为了解除中共与萧军之间的误会，胡乔木建议，可否把萧军在乡下的日记给彭真看一看？萧军回答：“这是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我这日记平常连的妻子全不能看，你们为了要懂得我底过程——从决裂的边沿上转回来——和试验我的真心！这当然可以的。不过，因为里面牵扯到别人，这让我考虑——”（44-4-27）考虑的结果，征得妻子的同意

（因为涉及到和妻子的私生活），萧军将自己的三册日记于1944年4月28日送给了彭真，同时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盼望从这日记中帮助党方面对我有一些较具体的理解。同时也可以知道另外一些东西，对革命方面也许有些益处。但我要附带说一声，这日记中我所批评的一些人事件，这仅是我个人的观感，对别人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前面说过了，这只是我个人的东西，并不预备出版。为了要证明我对共产党底信任以及您个人底信任，如今我是无任何保留地把这三册日记带给您。如果您认为有什么人有‘必要’看，我也已把这许可权委托给您，看去就是，看过以后希望早日还我，也盼望不要弄丢了页数和附件。”（44-4-28）

萧军的日记，到彭真那里半个月后，彭真给萧写信，说因患伤风，日记没有看完，特写信通知一声。萧军在日记中猜测：他有病是事实，但我估计那日记正在被别人——毛泽东——在看着，或被抄录。（44-5-13）共产党看了我的日记，我估计我们会更接近些，但我一定要准备他们对我弄些花头——因为他们自以为懂得我的弱点了，要挫一挫我的威风——但我决不让步。他们可以自负征服国民党，以至世界，但征服不了我的‘心’！除非他们用真诚而不用手段。（44-5-26）

笔者读到这里，连忙放下《延安日记》，看《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里面没有毛泽东翻看《延安日记》的记载。

萧军日记，经历文革。文革的批判家们，大概是萧军日记的第三批读者。萧军在检讨书中写道：如今在文化局组织方面所掌有我的全部日记，有些是在抄没我的物资时得到的，有一些也可能是从某些“渠道”获得的，但不管是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得来的，他们全是我亲手写下的日记应无疑问……既然也成为我的“反党罪证”，我也无话可说。（《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1969年3月26日）》）

关于萧军的《延安日记》，以及全部日记，要说的话很多，暂且打住。

这部书，对于作者，对于读者，对于延安，对于中共，都是一部重要的书。

当然，这100多万字的日记，要通读一遍也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气力的。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作了一些的归纳和摘抄，或许可以为读者阅读时提供一种方便，以及给那些没有工夫或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提供一个概要参考。

萧军说：我的日记也许有一天自己把它发表，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对读者、对历史、对党人、对知识分子、对日记中涉及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何以面对？■

【述 往】

## 追忆三线“五·七”厂（一）

马昌海

40年前“三线”企业多年的务工生涯，我未曾留下片言只语。读《记忆》第129期李南央《献给“三线”的青春》引发回忆，于是就有了动笔的冲动，一吐为快。我与南央都是66届初三的北京学生，而且有过一段多少有些近似的生活经历。我工作过的企业，名为纺织工业部“五·七”棉纺厂。是一个有细纱4万锭及配套的织布机，并且包括年产30万打衫裤针织厂的中型棉纺织企业。

### “五·七”棉纺厂的由来

熟悉的人，都知道毛主席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走“五·七”道路，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

原国家纺织工业部也在湖北安陆与湖南邵阳选了两个点办“五·七”干校，除了留守北京的两三百人，纺织工业部千余名机关干部一律下放劳动。在北京的纺织科学研究所和纺织设计院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连同这三个单位的行政后勤工人，也一起下放劳动。

安陆位于武汉西北110.7公里，是武汉至丹江口铁路上的一个小站，属于孝感地区的丘陵地带。唐开元十七年，李白娶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圜师之孙女为妻，住居白兆山下，写下《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等篇章。其自谓的“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就是在这里。一千二百年之后，数百名北京下放干部和家属，百余大学毕业生，数千青年工人，也来到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1969年6月，原纺织工业部200多名下放干部和家属抵达。8月，原纺织科学研究所及纺织设计院的350名下放干部和职工抵达安陆。在这前后，陆陆续续

还有一些下放干部来到安陆，但总数不详。所有的人最初都是在“五·七”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分三个点：从县城过府河往西五公里半胡棚村的“黄金山”，大家一般习惯称之为“五公里半”。往西还有一个“六公里半”，一个“八公里”。

在纺织部的规划安排下，这些下放干部在“五·七”农场劳动了一段时间以后，利用自己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优势，在而后兴办了几个“三线”企业：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含一个生产能力达中等规模的针织工场）、湖北化纤厂（位于襄阳县太平店镇）、湖北宜昌纺织机械厂、湖南邵阳纺织机械厂、湖南常德纺织机械厂。其中安陆“五·七”棉纺厂和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是下放干部最多最集中的两个地方。

## 初到安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安陆是湖北的三等县，全县只有38万人。1969年纺织部“五·七”农场开办时，甚至将原纺织部高碑店农场的几匹马都用火车从北京拉过来了（后来我在农场劳动时，因为有在草原插队骑马的背景，还受命照料过这几匹马）。安陆当地的牲畜只有水牛和驴，老乡说，过去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才见过这种马匹。当年的安陆县城总共只驻扎了九个日本兵，后来其中一个日本兵的尸体被发现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外，剩下的8个日本兵就开到这个村，烧了村庄。我在给学生讲持久抗战时就举过这个例子：日本想占领整个中国的确力不从心，兵力明显不足，一个县城只能派来区区9个兵。但为什么9个日本兵就能占领一个县城？这与中国人当汉奸有关。随同9个日本兵来的，还有一个中队的100多伪军。一个学生下课后对我说，其父母也在安陆工作过。原来他是老同学兼老同事叶超和王远慧的儿子。

小小的安陆县城在“五·七”厂兴建以前，只有一条弯弯曲曲铺着石板的狭窄“老街”，经常湿漉漉的。街两旁的旧屋歪歪斜斜，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全县最大的房子是原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的故居。此前有个粮食机械厂从上海迁至安陆，后来又在铁路以东的凤凰山附近兴建了湖北铝厂，生产铝锭。

1972年初，我从天寒地冻的锡林郭勒草原第一次去安陆“五·七”农场探亲。下火车后走了不少冤枉路，才找到已经从内蒙古开鲁县转到安陆当了工人的舍弟。我从小就与来自江汉平原的祖辈生活在一起，熟悉湖北方言。在锡林郭勒

草原待了近四年，却居然听不懂湖北的路人在说什么了，看来还是环境造成了语言习惯的蜕化。后来又在湖北生活了10年，大脑皮层里隐藏着的乡音才被重新唤醒，以致我今天还能不连贯地说几句不流利的湖北天门话，而且能准确地区分武汉、荆州、孝感、黄梅、钟祥、浠水等湖北各地的不同口音。

舍弟向工段请好假以后，我们携带着行囊，在蒙蒙细雨中走向“五公里半”。弟弟说，府河上原来没有桥，来回全靠摆渡，遇到风雨天，船工老乡还趁机提高摆渡费或停止摆渡，极不方便。后来是“五·七”棉纺厂出资修建了这座现代化的大桥。河水在桥下涌动，路旁的田野中，突然出现了一片金灿灿的菜花。我一周前还在冰天雪地的锡林郭勒草原，蜷缩在敞篷卡车上冒着刺骨的寒风前行，现在真真切切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行至半途，一辆回农场的手扶拖拉机冒着烟突突驶来，驾驶者是70届北京学生。舍弟与其打过招呼后，我们坐着拖拉机，回到了位于“五公里半”的家中。而后春暖花开之时，我回到锡林郭勒草原，拿到了转往安陆“五·七”干校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户口迁移证。

初到湖北，最难以适应的，就是绵绵阴雨的气候。在锡林郭勒草原，一年四季都是阳光灿烂，干燥风大。在湖北这种连绵阴雨的冬季，潮湿的寒气沁入骨缝，使我这个来自北国草原的牧羊人，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簌簌发抖。在锡林郭勒草原天天吃羊肉，抗寒能力强，四年之中我只感冒发烧过一次。来到湖北水土不服，时间不长就病了一场。病好以后去找也是从锡林郭勒西乌旗草原回来的小华，看到他额头上敷着一块湿毛巾，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正在发烧。下雨造成的泥泞也令人厌烦，每次出去，都带回满鞋厚厚的粘土，刮了又刮。被褥湿乎乎的，洗过的衣服10天都干不了。一旦有个难得的艳阳天，只见家家户户都忙着晾晒被褥和衣物。再就是每到冬春换季的时候，身上都会连续多天起包，常常是几十个，奇痒，也不知是对什么过敏。为什么在北方生活的时候就不这样？怎么连续七八年了还水土不服？

按照不成文的惯例，所有的青工在进“五·七”厂以前，都要在农场劳动三个月到半年，然后才正式分配车间和工种。

来到湖北，深深感到水田农事的辛劳，南方的农民比北方更辛苦。在北方，有几个农民会挑着百余斤的担子日行数十里？而这在南方是司空见惯的。南方极少见到北方的骡马大车，有个毛驴车运输或送肥就不错了。一般的运输工具就是

南方常见的两轮人力“板车”。春寒料峭挑塘泥，天蒙蒙亮的时候，赤脚踏入带着冰凌的泥水里，寒冷刺骨。如果是挑着两桶满是蛆虫的粪水在水田里施肥，脚趾必须牢牢抠住田底才能保持平衡。我挑着满满两大桶粪水，在旱路上还走不稳呢，结果连人带粪翻倒在水田里。我这个来自北方的笨拙知青，不谙南方大田的农事，常常受到一起劳动的湖北当地青工的嘲讽。

1972年的夏天到了，按照国家的规定，国企职工每人有一笔防暑降温费。防暑降温关系到全厂职工的健康安全。厂里食堂负责防暑降温工作的是我上幼儿园时的魏老师，小华和我被抽调进厂协助魏老师工作，提前结束了在农场的生活。每年防暑降温的工作，加上做准备和扫尾大约三个月。主要是做冰水饮料，就是在通过了高压陶瓷棒过滤的自来水里放点糖精和食用香料及染料，糖放得很少，然后在水里放进冰块。各部门都可以拿着暖水瓶来打，或送到各车间的保温桶里。安陆县卫生防疫站虽然每年都来取样检测饮料冰水的卫生指标，但也就是官样文章。而我们出于责任心还是要经常清洗高压过滤器中的陶瓷棒，用水砂纸打磨，换掉破损的陶瓷棒。此外，防暑降温的第一个月常常去农村拉西瓜回来发。虽然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但总有摔破的熟西瓜吃。常有人要求换一个熟瓜，有的人可以不厌其烦要求换好几次。如果他态度蛮横，就免不了发生争吵。时间一长，我也学会了挑瓜。还有的人拿着个小瓜，非要换个大的，也免不了吵架。做后勤工作就是这样：“一人难称百人心”，总有人不满意。我整天在西瓜堆里，根本不把一个生瓜当回事，但发到别人手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不能吃的瓜，没有选择的余地，你让人家怎么满意？

厂计划科长常从我们这里拿十几个西瓜装上，乘吉普到11万伏变电站去慰劳，以利于厂里的正常供电。在那个年代，不知在夏季之外，厂里是如何“打点”供电部门的。那个年代常常限电停电，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一遇停电，车间里就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片，正好趁机休息一下。麻烦的是，停电的同时会停水，给职工和家属的生活带来不便。我有多次在夏日的凌晨，被青年工人人们的喧闹和吼叫声所惊醒：由于停电停水，一身臭汗和棉花毛的夜班工人提前下班回到宿舍以后，在楼道里高声喧哗。由于无法洗漱入眠，就隔窗对着相邻的厂长居住的宿舍楼大叫：“潘定生！没得水，老子日你妈！”其实这样的发泄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至于是否因此而影响了他人的休息，那他们就不管了。



(上图：1972年9月纺织部五七棉纺厂门口)的。最尴尬的，是停电停水后从澡堂里摸着黑，披头散发、慌慌张张跑出来的女工们，如果有人刚刚打上肥皂，却突然停水停电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到了第二年的1973年初夏，魏老师带着我们去武汉市的冷饮厂观摩，学做冰棍。因冰水饮料供应不限量，浪费很大。我于是决定在冰水饮料里不再放糖，只放糖精、香料和颜料，把宝贵的食糖集中放在冰棍里，在冰棍配方里只放一点点糖精。后来觉得发西瓜太累太麻烦，日夜不得安宁不说，还要请司机班出车，看某个大爷的嘴脸。我们就着重做冰棍发放。除了做果汁和牛奶冰棍，我还用可可粉做出了巧克力冰棍，受到极大欢迎。离开北京好多年了，居然在“五·七”厂吃到了巧克力冰棍，大家当然高兴。

我虽然在白天里做着全厂最清凉的工作，但夜晚的酷热还是无法逃脱。在气压偏低、闷热潮湿的夜晚，坐着不动都会流汗。湖北的蚊子又多又大，毒性也大，常常被咬出很多大包。那个年代在湖北基本上见不到纱窗，必须用蚊帐，这就更加重了闷热。侧身睡，汗水会像众多蚂蚁爬过一样，从上往下流淌。翻身换个姿势，汗水又反方向流淌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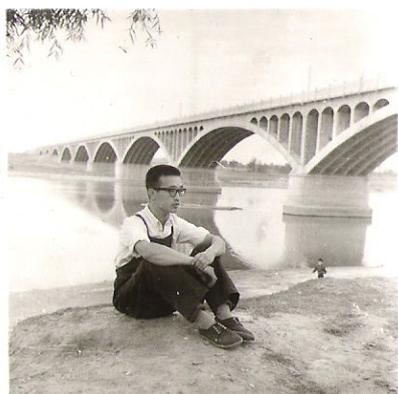
到凌晨两点还睡不着，爬起来往身上泼水。中午睡一会就热醒了，真是受罪啊。

刚刚来到厂里，就听说众多农民在队长的带领下打破工厂的围墙，成群结伙地公然抢走了不少煤炭，结果有青工还因打伤农民受了处分。由于对农民已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也就没有因此而太奇怪。北方人知道什么是南方农民的“冲担”吗？两头用尖尖的铁皮包裹，锃光瓦亮，是用来挑谷的，一使劲就可以把人的肚

子捅个窟窿。农民那么苦，抢点煤就抢点吧，不怕他们的“冲担”吗。

## 正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

1972年夏季过后，我终于分配了正式工作：细纱车间保养工，常白班。发了一条背带裤和一顶帽子。看看我领到的工具，就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了：两个油（下图：1972年9月在府河边）壶，塑料壶装锭子油，长细嘴的铁皮壶装机油；



一个装着工业黄油的小铁盒；三把刷子；一根1米多长的细竹捻棍（用来清除附着在细纱机底部隐蔽处的棉花毛）；几块破布；一把锥子；一个小扳手。名为“保养”，其实就是个清洁加油工吧。所谓细纱机保养工，就是在细纱机运转数月后，拆开细纱机用于牵引、延伸粗纱的三根细细的长轴（术语：罗拉），擦干净，抹上油再装回去。还有皮辊、锭子盘等部件的清洁和加油。这

工作毫无技术性可言，只要手脚灵活就可以。保养一台细纱机需时一个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两台。因为是要求六个人在组长的指挥下协同一致动作，一个人的动作慢了，就会引起他人因等待而造成的不耐烦。所以我每天都有6个小时是在恶劣的空气和噪音环境里，弯腰撅腩、手忙脚乱中度过。刚开始很不适应，每天下班都腰酸背痛、疲惫不堪。当初从草原来安陆当工人是怀着学一门技术的憧憬，以实现加入伟大工人阶级队伍的理想，却没想到当个工人这么辛苦。还是在草原信马驰骋自在啊。我常感到自己反而成了细纱机的附属物，面对高速运转的庞大机器无可奈何，恨不得砸烂这个A512细纱机以求解脱。多年后，在大学历史系学到英国工人运动初期以捣毁机器为特征的“路德运动”和“斯温暴动”，不禁想起了我自己当年的真切感受。

细纱机保养用纺织行业的上海话发音是“揩（ka）车”（擦车）；保全叫“平车”（把机器拆开重装）。上海是老纺织基地之一，所以纺织行业的好多传统术语都是从哪里流传下来的。在“五·七”厂的各车间，保养和保全都是合二为一的，保全工按照计划进度，即“揩车”，也“平车”。唯独在细纱车间，保养工和保全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前者是熟练工，后者是技术工种。但工资待

遇却完全一样，都按照四类地区轻纺行业技术工种的标准发放。学徒工第一年月工资 22 元，第二年月工资 24 元，第三年月工资 27 元，第四年转正，一级工月工资 31 元，第四年转为二级工，月工资 36.3 元。1974 年我借“批林批孔”运动还就此写过大字报，认为细纱“楷车”就是熟练工，为什么要按照技术工种的标准发放工资？细纱车间的熟练工种，第一年的月工资就是 29 元，第二年月工资 38 元。结果回答是：细纱车间的保全工，一般都是由保养工转来的。再问：为什么不能等以后真的转成保全工了，再重新调整工资？不予回答。

那个年代厂里食堂的伙食极差，有时一个月也见不到肉。为了改善伙食，与南央所在的“陕汽”一样，厂方也逐渐开始偷偷用国家调拨的钢材等计划物资去换猪肉。有一次在河南某地做交易，为了掩人耳目，天黑以后才装车，然后做好巧妙伪装，连夜开车回程，昼伏夜行，以避开路上的检查。结果回到厂里卸车才发现，一片片猪肉都是被割去了瘦肉的肥膘。显然是对方利用黑夜装车，在事先就做了手脚。瘦肉的价格当然高于肥肉，对方这样做，等于是又赚取了一笔差价。食堂只好将一车肥肉存进了冷库，以后再分批取出来熬成猪油，慢慢炒菜用。这就是厂里食堂为什么要建一个冷库的原因。全厂七千多职工和家属，后勤保障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猪肉储备，细水长流。

伙食不好，大家只好动手动脑的自己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可比李南央所在的“陕汽”要高一个档次。与老乡换鸡蛋、菜油是一样的。但湖北毕竟是鱼米之乡，天天吃大米白面，比陕西岐山的山沟里要富庶。农户普遍大量养鸡，鸡蛋最便宜时 6 分钱一个，冬天 8 分一个。一斤粮票合一毛钱。“腺鸡”（被阉割后的公鸡）7 毛钱一斤，母鸡 9 毛一斤，鲜美的甲鱼最初是三斤粮票加五毛钱一斤，合 8 毛。但很少遇到，后来也涨到 9 毛甚至一块钱一斤了。

每到周日的清晨，天一亮，厂里的人们就像出窝黄蜂一般涌向只有一条马路的安陆街头。这条街还是有了“五·七”厂以后才兴建的。“五·七”厂数千职工和家属的到来，提升了县城自发农贸市场的物价。人们几乎是见什么抢什么：鸡、鸭、鱼、蔬菜……，出手稍慢，或者起晚了，就只好买几个鸡蛋怏怏而归。

满载而归后怎么做熟？凡是 20 世纪七十年代当过工人的，恐怕都熟悉一个词汇：“干私活”，就是利用国有企业的设备和原材料制作私人用品。比如精美的台灯和落地灯。很快就有人模仿买来的煤油炉，开始自己制作煤油炉。尽管烟

大火苗发红，煤油燃烧率不高，但也马马虎虎能对付着用了。自己制作电炉就更容易了，但最好不要超过 1500 瓦。由于电炉的普遍使用，青工宿舍楼经常跳闸断电，大家都备有保险丝，马上就会有人接好，前纺车间青工宿舍楼的保险箱甚至被人换成了铜丝或铁丝，烧得通红！

每个周日都要忙活到中午，我们才能开始享用难得的菜肴。啤酒极少有，喝了点白酒，大家就会开始发牢骚，慢慢地也敢发泄对文革和现状的不满了。一顿饭常常会吃到下午两点，酒足饭饱之后再美美地睡上一觉。晚上去食堂买点米饭，把剩菜打扫一净，刷锅洗碗收拾放好，再期待下一个星期天。

当了两年工人后，大家都学会了做几样菜，尤其是烧鸡鸭和鱼。离开湖北很多年了，一直认为那里最好吃的东西是鳊鱼和甲鱼，味道鲜美。

厂里最早盖起的几栋单身宿舍楼，后来修了围墙，作为男人不得随意进入的女工宿舍。男工就以车间为单位住在家属楼里，最小的厨房两平米，只能住一个人。大房间最多可住五六个人，上下铺。刚刚进细纱车间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蜗居在一间 6 平米的小屋里，真可谓是“鸽子笼”。厂方多次调整宿舍，有一次，青工们在 40 度的高温酷暑之下被逼着搬家，只见楼前和路旁，到处是五颜六色的纸箱杂物，怨声载道又无可奈何。我记得王学东就此发牢骚：我们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却受过“五·七”厂的苦。我们在“五·七”厂受过的苦，当然不仅仅是在高温之下搬家吧？ ■

【述 往】

## 插队的那些事（十三）

——雨村读书

朱 特

我是1964年上的中学，在中学里正儿八经地读了两年课本，然后是丢开课本闹“革命”，胡打混闹又是两年。待到1968年秋天我不到18岁的时候来到雨村插队，成了那里的新农民。说起来我是“初四”的文化学历，但实际和半文盲差不了多少。

那会儿是知识大贬值的年月，流行的说法是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能不能和贫下中农相结合。读书多的人不吃香了，吃香是大老粗，所以我在小村里就跟老乡们说我是一个大老粗。自称老粗也并非真的以“革命者”自居，那会儿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了，可在来小村之前我好像懂来着。来到雨村和那些老高三的比，我才知道了自己“初四”的文化水平的确“粗”了点儿。

有了对照的镜子，心中那从未泯灭过的求知欲望又在那时迸发出来。与知识大贬值相对应却是图书的金贵，书成了彼时的稀有物件，想找本书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朝夕相处的几位仁兄虽然是书香门第，但带到小村里的书籍并没有什么，这内中的原因不问也知。

从他们那里我最先得到是高中物理教课书。教课书也是书，翻开看看觉得有点意思，便试着学习，不懂的地方就向同一炕头的仁兄请教。学到自由落体时难度加大，我的那点数学底子太潮，有点接济不上了。此时，一位仁兄道一声：“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用，还不是在这里修理地球。”我一听，也是。于是课本完璧归赵。现在想起这位仁兄的话仍是别有一番滋味。

接着又从叶公处讨来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说《苹果树》。书的主人英语极好，据说在校时他的英语课是免修的。这是他的“教课书”，我当然只是看中文。说来惭愧，到这时为止，在我的读书记录中都是国产货，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爱情小说，一个美丽而又凄凉的爱情故事，书中那个为爱而殉情的女孩儿，让我五

迷三道了好几天。这本书打动了，让我记住了它。在图书开禁后，我特意去外文书店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请回了家，虽然我的英语水平依然是只认识26个字母。留下它，是留下我的一段生活。

《古文观止》也是从叶公手里借的。那书看着就透着有学问，封面古色古香，翻开：繁体字，竖排，从右向左读。这本书只让我兴奋了一天，在我手上捧了不到一个星期就送了回去。它的文字对我来说堪比天书。读书中的知难而退，也许是我的一个优点。这样做，会让一个人保持阅读中的愉快，但不会让人学有所成，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后来我又从邻近村的知青那里得到了两本鲁迅全集。当然是看完一本再换一本，而且一定要保护好。读这两册书时，二饼子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老三是鲁迅问题专家，读不懂的你可以向他请教。我没有往心里去，只想看完这本再向书主换下一本。这位书主是一位落了难的“官二代”，带来一箱子图书。我囫圇吞枣地读完鲁迅的书后，又从他那里得到两册大跃进时代北京大学的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据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这两册书吸引我的是那些引用的古诗词。我觉得古人写的东西比写这本书的大学生们强多了。还找一个小本子拣自己喜欢的抄了一些。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得到了一本内部刊印的《唐宋词35首选》。这个小册子可能是京城里哪个中学在文革前自印的教学参考书，封面封底没有任何修饰，白底黑字素面朝天，简体字，横排，当然是从左向右读，还有简约的注释。现在想来，这35首词作，应该是经典中的精华。它怎么到我手里来的，又是怎么离开的，我早已经淡忘了，但它的到来却注定了我一生的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这朵奇葩从此便伴随着我的读书生涯，地老天荒。

这本不足30页的小册子辗转到我手中时正值秋收初始，生产队让我看青。看青是个单兵作战的营生，不必随大伙下地，时间上可以自由支配，只要大田里无人劳作了就是我下地的时候，不让牲口家畜和“阶级敌人”破坏地里的庄稼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有了这本小册子，单调孤寂的看青营生不再显得乏味。先人们那些抑扬顿挫的长短句，充满着律动，隐含着无音符的音乐，或慷慨激扬，或浅吟低唱；不论是横刀立马仰天长啸的英雄霸气，还是长亭相别折枝杨柳的百转柔情，都让我惊

叹天地间有如此美妙动人的文字。

那几天我在地里转悠时，只觉得天地之间变得更加阔大起来：头上是高天白云，脚下是广袤田野，远处是逶迤青山，读到兴奋之处就大声吼将出来，反正周围无人，不管发音正确与否全然不顾，以我的那点可怜的语文底子自我解读诠释，只求心领神会，不求词意达诘。从那时起，这本毫不起眼的小册子如同潺潺溪流把我引向浩瀚无际的海洋。

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在我手里停留多长时间，当它离我而去很后悔没有把它抄下来。

在高原的小村里我只待了短短的3年，虽然正是读书的黄金年龄，但所读书目乏善可陈，大好光阴虚度，真是“老矣真堪愧，回首望云中”。

## 朱罗军印象

朱罗军和我同姓，一笔写不出两个朱，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

朱罗军是京城女十中六七届的初中学生，是我们这个“饭团”中的一分子。我们乘同一列绿皮车离开京城，同一天来到雨村。她可以不来雨村的，据新国同学说当时班里只有四个名额，本来没有她，但朱罗军“非常革命，争强好胜”，坚持要和同学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她央求新国同学帮她到安置办游说，在内蒙古来京接收知青的干部前说好话。争取到名额后，她的母亲不同意她去内蒙古插队，还把户口本藏起来，又是在新国同学的帮助下说服了她的爸爸妈妈才得以成行。这些我都相信，我离别京城时内心何尝没有被忽悠得忘乎所以，怀揣着大志向？多少年后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新国同学曾写过一篇怀念朱罗军的文章，感情很真挚，道出了对老同学的一份真情与怀念。读了她的文章，我眼前浮现出这位昔日同在雨村插队的同学。

在我的印象中朱罗军仍然是40多年前的样子：个子不高，大眼睛，两条小辫，面色微黑，方下巴显示着性格坚毅有主见，最初行为举止隐隐流露出当年革命小将的风采。在五个女生中她是最能干的一个，这和在家是长女有关系。我们在一个知青点里共同生活了三年，但过话实在有限。过话不多一则雨村知青男女界限分明，再则她的性格有点内向，三则或许与我的性格顽劣脾气暴躁有关，我和她曾有过争吵。

那还是在小营子的时候，入冬时节男生只剩下我还没有回家，女生那边也只有朱罗军和另外一个女生没有回家。朱罗军是因为她的父母在远离京城的江西省五七干校，她无钱探亲也不想给父母增加困难；那个女生是陪她一起过冬的好姐妹，她们要在雨村熬过漫长的冬天。我没有回家。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想和大营子的阿生相跟着走。

为了回家，我把集体户的食油拿了不少，和阿生打路上吃的干粮。这事做得实在不应该，更不应该的当朱罗军她们批评我时，我却蛮不讲理粗野之极。我想这种表现一定伤害了朱罗军，或许就此在她内心深处把我划在了另类。

新国同学说朱罗军能干，不怕吃苦，学农活也快，这都是真的。但我更记住了她的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她曾经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员，经常到各村演出。1969年的夏天我到大青山里当修路的民工，朱罗军所在文艺宣传队到工地上作慰问演出，那是我第一次看她演出，也是唯一的一次。

演出是在晚上进行的，山沟里不大的民工营地上整理出一个土台子，电灯不够亮又点上了几盏（烧煤油的）汽灯，把民工营地照得雪亮。民工们早早地吃过饭，把个土台子围起来等着看演出。朱罗军就和她的队友们在土台子上面唱歌跳舞，用文艺的武器批判封资修和他们的孝子贤孙，歌颂文化大革命。记得她好像扮演了白毛女里面的喜儿，与一位男演员演了其中一个片断。

我现在记不得与她打没有打招呼，演出没有看完就和也是当民工的知青回工棚聊天去了。我只记得这次演出对民工们来说如同一个盛大的节日。夏天大青山里的夜晚也是很凉的，有的民工就披着花花绿绿的被子观看演出，站在高处看下去煞是有趣。

第二天宣传队离去后，演出的余韵仍在山沟里飘荡了好几天，成了民工饭后茶余的一道细嚼慢咽的大菜，许多老乡也都知道了我和那个演喜儿的知青是一个集体户的。可见朱罗军给民工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了她的“粉丝”。

如果说我和朱罗军有过亲密接触的事，就是她当了雨村的赤脚医生后为我们打防疫针。那个晚上在小学校的教室里，每个人都要和她亲密接触，当然我也不例外。问题是当所有的人都打完针后，却没有人能给她注射疫苗了。当时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时，我突发神经自告奋勇提出由我给她注射疫苗。这是我最好的表现机会，出风头是一，再则也想让她改变对我的看法。

在场的人都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我很自信地说没有问题。心里却想，这打针还比我驾牛犁地还难吗？当她信任地把注射器交给我的时候，面对她的手臂我的手却无缘无故地哆嗦开了。从来没有拿过注射器是一回事，当时的心情突然起了变化，这一针下去万一有个好歹可怎么办？一分钟前还是豪气冲天的我此时却汗流浹背。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怪物！注射还是由她自己完成的。我不知道那天的举动给她留下什么记忆，也永远不可能问她了，于我却是赧然而退。

我在呼和当学徒工时，有空就回去看望还留在村里的弟兄们，这时朱罗军既是赤脚医生又在大队部管理药房，不用再到大田里“上班”了，这样的工作对留村知青来说是相对轻松的好营生。听说，她对此项工作很喜欢，工作起来也很认真负责。我回村和她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没有多余的话。

雨村个别老少爷们有阿芙蓉癖，无正宗品牌就寻找替代品。在村里时有村民让我回京后想办法买大瓶装的止痛片。那时商品都稀缺，止痛片也是稀缺的俏货。起初并不知内里，后来才明白那里有吗啡的成分，可作阿芙蓉的替身。我在地头歇工时，看到有后生家围在一起用锡箔纸烧药片，吸那蓝色的烟。我也起哄架秧子凑热闹吸了两口，一股怪怪的味道，没觉出好来，还不如田二给我的小玉兰花烟叶。

朱罗军管药，药里包括止痛片，有嗜好的老少爷们自然是就近取材。朱罗军的革命性不允许她对社会恶习姑息迁就，于是，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个别倚仗着贫下中农身份的烟民无法解脱烟瘾，就用恶言秽语发泄内心的不满。有人劝她何必那么认真，谁要就卖给谁好了。但朱罗军回答是：“要坚持革命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与那些不良作风斗到底。”精神可嘉却也显出怪异。原本与村民关系很好的朱罗军常常与村民吵架。

那时，我们十个人的“饭团”只剩下三四个人，每一次有人告别“饭团”对留下的人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当女生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心中的郁闷无人可排遣，受到的委屈也无人诉说。她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关闭在小屋里，不和仅有的几个知青接触。朱罗军此时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终有一天，村里人们发现她病了，病得不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当她的父亲来村里接她的时候，她竟然不见父亲，表情古怪地发誓坚决不离开雨村，要在这里插队一辈子，做一个铁杆扎根派。看到这种场景，当父亲的只能是心中泣血。

这时她来雨村只有六年的时间，一个鲜活的女儿家成了精神紊乱的重症病人。

又过了几年，我得到了她最后的消息：因病去世。朱罗军是唱着歌来雨村的，歌声犹在，人已凋零。新国同学说如果朱罗军不来雨村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可是生活没有假设。

但愿朱罗军在那边没有烦恼。

## 多余的话

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说起“知青”这个词都明白它的特定含义，即当年曾经上山下乡的青年人。这代人现在都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还是自称或互称为“知青”。第6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把知青的这个义项收了进去。

当年的知青群体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这个群体的成员经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已经分化并融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除少数幸运者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的一分子，在社会的转型中经历了新的磨难。如果说当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进行的时候知青群体还有着共同的诉求，那么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已经没有人再以知青的面目提出什么经济与政治诉求。那些有过知青经历的、有着话语权的头面人物，则是代表着他们的集团利益在言说。知青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维系知青人的纽带只是当年的共同经历。雨村的知青也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生活岁月，多少年来都保持着浓厚的插队情谊，不管现在的身份有什么不同，但在知青名下就都一样了，时不时地聚在一起话当年。这种情感也是生活的馈赠吧。

我将陈年往事翻捡出来并晾晒一番，多半出自怀旧情结或是获得诉说之后的满足。二饼子当年说过一句外国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当时我不懂，请教三哥，三哥给我讲了我还是不明白，直到过了好几年才体会到了它的真谛。现在当我把那时的生活用文字表述出来时，我又想到了这句话。因为我的文字功底欠缺，生活的多面性用文字表达出来总是缺乏立体感，缺少色彩。所以当我写了几篇作文之后，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是我的真实生活吗？我感觉到在文字之外还有着另外的，无法用文字表达的诸多方面。

在我回忆往昔并从中找寻更多的细节时，我陷入困惑：我的叙述会不会美化那时的生活？美化那个荒谬的时代和那个已经被历史证明彻底失败并是摧残青年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我被社会的大潮裹挟而来时，除了一腔热血与青春的幻想外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3年后，当我离开它时，没有凄凄惶惶一步三回头的不忍离去，有的只是一种解脱，一种终于熬到头的心情，没有痛苦只有轻松。

离开雨村之后，它便常常入梦。只不过梦中不是留恋的难以忘怀的岁月，而是因为我的招工手续不全又被工厂退回雨村重操插队旧业。为此我常常在据理力争时从梦中醒来，摸着过速跳动的心口充满着莫名的感觉。同样的梦境在许多年里重复出现。我曾向插友说起过，竟然不止一位插友说类似的梦境也把他們从梦中惊醒。怪哉，莫非在潜意识里，雨村竟是我们的梦魇？

在我叙述的生活的背后是充满谎言的时代，是全体国民在充满帝王思想的君主与专制权力的魔杖下瞎折腾的时代。知青，实在是20世纪中国特色国情下的一个怪胎，从它的孕育到诞生都是瞎折腾的结果，它注定长不大也成不了气候。一代知青就成了瞎折腾的祭品。

我对于青春的回忆是经过时间的淘洗、留在大脑皮层最深刻的那些细节，是不会消失的记忆。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恶劣，物质生活多么匮乏，青春总是美好的，青春总能在生活中找到快乐的因子。光阴似水悄然逝去，长沟流月去无声，青春已远。几十年来一介草民为了生活东奔西走，既有生离死别也经历了社会的动荡，既领教了掌权者为了捍卫权力采取的严厉手段也看到了大佬们的各式嘴脸。所有的风风雨雨，那雨村就是开头，于是它在我的心中就珍贵起来。逝去的青春自己珍惜，把那时岁月的碎片捡拾起来就是为了记住。记住我曾是知青，那是我的青春时代。■

（全文完）

## 【文摘】

编者按：2014年9月，本刊在第119期上发表了米家农的《我的检查与交待》。今年是“九一三”事件发生的第44个年头。在周向红女士的建议下，本刊再选叶家农《我与“9·13”》一书中的部分文字刊发，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一年前，周向红曾为119期写了推荐语，因故未能刊发，现将她修订后的推荐语发表如下。

《我与“9·13”》这本书，是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广州管理局政治委员的米家农受“9.13事件”牵连出狱后写的一本自费印刷的自传，是他个人经历“9.13事件”过程的全纪录，并未正式出版。其内容详尽，仅大小目录就多达84个，附照片239幅；时间记忆准确语言朴实无华，对于想了解那一段时期历史的人而言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1970年下半年至1971年9月，因父亲与米家农夫妇的关系我和他们相识，常常去看广州民航局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9·13事件”后上了中央文件的“战斗小分队”——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因而和米家农夫人、宣传队指导员吕阿姨及他们的幼子熟识。在“9·13”事件后被囚的第一个学习班里，我除“揭发材料”之外还尝试写了杂七杂八的诗，其中有一首不乏嘲讽的藏头诗，将包括父母和几个熟悉的伯伯阿姨点到，诗中就有“米满原来是空缸，吕乐(yue)更比西乐强”的一句（“米满”的“米”即指米家农；吕乃我国音乐十二律中的阴律，有六种，总称六吕；“西乐”泛指西方文艺。因为吕阿姨从事文艺工作，遂称其为“吕乐”），可见我当时的凄凉、失落、担忧和困惑。所以当我读完这本凝聚了米家农伯伯最后心血、长达350页的书时，感到格外沉重的同时也感到十分的欣慰。

米家农伯伯是2012年元月2日去世的，他终于还是没能活到书中所愿：我今年90岁，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参加打过的大仗、小仗、硬仗、恶仗百十次，党给了我并不低的荣誉和地位。由于“9·13”事件，我从广州沙河监狱到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了十多年。很多人说，一个人经受这么大的打击不死也会疯，我却活到今天，问我长寿秘诀。我能有什么秘诀？就是想看看上

头最后给“9·13”一个什么说法，不想吃的时候强迫自己吃几口，心烦的时候强迫自己平静。

四十三年来，浸淫在“9·13事件”的圈子里的我，听过、看过的回忆可谓不少，但像这么完整、实在、坦诚、接地气、难掩人性光辉的描述几乎没有。让我们于平淡中见忠诚和胸襟，于平静中见高贵和坚韧，正如此书开篇第一页赫然的八个字：顾全大局，无愧人生。

为了纪念“9·13”，我特意从米家农的书中选出两份上报原件《我的申明》、《我向党的认罪书》和《关于“战斗小分队”的问题》一文，将录入后的电子版交给《记忆》发表，并希望《记忆》能够从此书中多选些文字，以飨读者。■

## 我的申明

(1980年8月31日)

米家农

(一)我写的有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检查揭发材料，均应以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日上交的《我的检查交代》为准。凡是在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应作废，或重新审理。理由是：

1. 因过去是在“四人帮”当政时期写的。当时的办案原则和专案组人员反复交代的政策是，“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现在看与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衡量，两者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且与“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也是相违背的。

2. 过去写的材料，是当时在围攻挨斗和指使逼供信情况下写的。还有一些材料是专案组指定问题、具体内容及规定写法，和经他们修改过后又责令重新誊清上交的。显然这些做法，都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合的。

3. 我的思想认识糊涂有责任。过去，曾抱有一种幻想和侥幸态度，误认为“不管问题有多大，只要专案组提出需要，叫写叫写，说明态度好，能得到宽大

处理。”至于材料是否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由此可能引起会产生其它别的什么不良后果则考虑得不够。为了能够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对过去那种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和违心的做法，我现在应当主动向组织上申明改正过来。

（二）“凡在过去”，时间是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不包括1980年2月27日以后公安部、总政保卫部新的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写的材料。

（三）过去“围攻挨斗”是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州办学习班。

（四）过去“指使逼供信”举例主要有：

1. 1971年冬，被关押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中，专案组数次指使逼供信我写的“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这个材料是当时我在被逼供信情况下瞎编写出的。

2. 1972年2月，丰台专案组为了制作供中央首长的录音，关于“陶铸别墅情况”那份材料，是经专案组指点修改两次后，又要誊清和念的。

3. 1973年春，亚疗专案组把我在广州、丰台写的有关涉及江青的材料从合订档案中抽出退给我让销毁，又要我重新编写材料补进去。并责令我另写一份“检讨”附上。

4. 1978年3月，亚疗专案组把我1972年2月在丰台写的综合交代材料和另一份材料（关于毛主席同广州军区首长谈话指示记录和王斌传达顾同舟让准备机组的问题）给我，要我大加压缩，规定我把数十页材料压缩到不超过三页。我压来压去，说不清问题，还有四页。上交专案组后，从问题观点、顺序和写法，暗示我写成一个“关于我参加林彪武装反革命政变”的交代材料。专案组对我写的第一稿（压缩稿）作了大的变动修改，要我重新誊写为三页。专案组亲自到我房间里把材料收走（这是从来没有的），并当面把经他亲手修改过的原底稿也要走了。

我对自己问题性质的认定：这是一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次特殊事件（9.13），属于党内路线斗争，不仅具有政治性，更有历史性和社会性。

我的态度：无论组织上最后定什么性，做什么结论，定什么案，戴什么帽子，怎么样处理，我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因为我要顾全大局。

因为我当初参加革命的动机，参加共产党与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与目的达到了。一句话，我“无愧人生”。■

【文摘】

## 我向党的认罪书

（1980年9月15日）

米家农

1980年8月20日我在秦城监狱写了《我的检查交代》材料，中央专案组审阅后指出我“在林彪事件中不是犯的错误，而是犯了罪，要向党认罪。且文字也写长了，要压缩，检查交代材料要重写。”

我不认为自己犯了罪，但在专案组不允许说话的强硬要求下，我于1980年9月15日按照他们的要求，又重新写下《我向党的认罪书》。（全文4380字）

文化大革命中，一九七零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林立果秉承林彪的旨意，打着搞“调查研究”的幌子，曾先后四次窜到广州住在白云机场。一年中，自我与他认识追随其为林彪篡党夺权搞阴谋活动中，对党犯了严重的罪行，给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不良的后果。我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数十年的培养教育。追溯沉思，令人甚感痛心。现将我所犯的罪行向党和人民检查交代如下：

**一、我向林立果提供了为林彪篡党夺权在广州高阴谋活动的据点及各种方便条件，并掩护了他的罪恶活动**

1. 自一九七零年九月下旬，林立果第一次到广州开始，我把白云机场候机大楼的小宾馆提供给他为林彪篡党夺权进行阴谋活动的据点。并向其提供了吃、住、用、行和安全、保密等各种方便条件的保证。一九七零年九月和十一月，林立果带着他的死党周宇驰一伙先后两次都住在候机大楼小宾馆的三层。一九七一年的五月和七月，林立果又两次到过广州。他本人虽未住在机场，但他在白云山上的伙食、生活用品等物，仍向机场索取，由民航负责供应。林立果在机场宾馆和贵宾室曾多次接见过广州空军、民航总局的领导干部和广州空军机关、部队及

驻其它地区空军部队到广州的一些负责干部，进行反党串连阴谋活动。即便林立果不在广州时，他的那伙死党及其随行人员也是经常不断来往于京、穗，占据着宾馆。一年中，宾馆实际上是被林立果一伙完全霸占着。不仅政治上使党和人民遭受到极大的危害和恶果，在经济上他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奢侈和浪费。这个直接的主要罪责，责无旁贷地应当由我来承担。

2.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我按照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的电话指示（经他的秘书程兆贤传达）和总局后勤部部长李一民给我写的信（他俩说，总局拿出两万元钱为林立果在广州搞技术革新盖房子用），要广州民航把款料先垫出交给广州空司管理处长陈伯羽，待房子工程竣工后，再由广州民航后勤部向总局后勤部结账。并告诉要注意为其保密（所谓一号工程，即从经费开支上由此而来）。这个任务我当时接受了，把它交给广州民航后勤部长赵德保经手具体承办的。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我临去总局开会前，我问过陈伯羽这个工程搞得怎么样，他曾领我到现场看过一次。我才知道这栋房子是建在白云山顶峰广州空军部队营房驻地一侧。我心思：这哪是什么搞技术革新，实际上是一座清静凉爽的小别墅。是林立果搞反党阴谋活动的一所秘密据点。虽然当初盖这个房子的起因用途、选址、设计和组织施工我没有参加与研究过，但我接受了刘锦平和李一民要广州民航把两万元料先垫出交给广州空军的指示。我照办了。我应负的罪责是不容推卸的。

3. 把广州机场跑道东侧白云水库沟里原陶铸的别墅修复成林立果为林彪篡党夺权搞阴谋活动的新据点。我要承担主要的罪责。一九七一年二月，我按照周宇驰电话传达的林立果的意见，向广州军区和市革委会把房址产权要过来。我主动出面向广州军区首长丁盛、任思忠和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提出要求，把陶铸、林西和广州市城建局长的三栋房子（已遭造反派的严重破坏）拨给民航，把它重新修复接管使用。七一（指一九七一——编者注）年二月和五月，我曾先后陪同周宇驰和林立果到水库沟里房子的现场去勘察过。修复工程开始前，常委会在我主持下对这项工程进行过具体研究。我还审查过修复施工图纸。我当时对这项工程是抱着积极态度的。其思想动机的起因是，我和周宇驰初次到水库沟里房子的现场察看时，曾听到他对沟里满山青松翠竹、清静优美、潺潺溪流过的环境赞赏不已。还听到他自言自语地低声念叨了一句：“这地方如果首长来也可以住的。”我听了虽未明问他，但心里揣测和领会他说的“首长”是指林彪。另外，

我还听说空四军在虹桥机场建有一栋别墅，林彪到上海时就住在那里。这样就促使我积极参与和要把陶铸的这栋房子修缮好。我心里暗自想过，房子如果修好以后，林彪来广州时能住上一次，也算为民航增添了一份荣誉。

## 二、狂热宣传庸俗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积极为林彪篡党夺权造舆论

1.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和七一（指一九七一年——编者注）年七月，在我主持下常委开会研究先后派干部到空九师去“学习取经”。我积极参与了这一荒唐活动。第一次取“经”回来，在广州局大肆宣传空九师的所谓“先进经验”。这些荒谬的论点主要有：（1）林立果给空九师送来飞行安全技术革新的所谓“福音”；（2）学习林立果，首先要培养对林立果的感情；（3）发动群众，人人动手，抄写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口号是“抄一本，对林立果的感情就增一分”；（4）有的基层单位为了“学用结合”，采用业务对口方法，介绍了从空九师学来的所谓空、地勤各类人员和家属的学习“典型经验”。民航没有“讲用报告”的本子，除也发动群众抄外，后来在我的授意下，办公室把查全伦翻印存放在白云机场的铅印本，下发给各单位一千多本。顿时煽起一股狂风浊浪。

2. 一九七一年七月，广州空军在空九师召开“学习林立果”现场会后，我当时在紧跟追随、不甘落后的思想支配下，头脑发热、高烧膨胀到登峰造极，竟然极其荒谬地提出要搞什么所谓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周年讲用报告活动。并批转了湖北省局和第十六飞行大队的一些所谓“学习典型”材料。我还要办公室整成所谓“情况简报”上送林立果和刘锦平、总局政治部，以博得他们对我的赞扬和信任。一九七一年五月，我曾及其愚蠢荒唐地告诉办公室主任张春堂，要他把林立果在广州民航的几次接见谈话记录和活动情况收集起来，整成档案材料，以免失落，准备为林立果树碑立传。

3.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我在广州局一次干部会上作了一个“向林立果学习”的带头讲用发言。这次讲话内容，通篇是胡说八道，对林立果进行了极为庸俗和令人恶心的吹捧。我在会上还荒谬愚蠢地讲了要顶所谓当前一股有人反对林彪的逆流，并提出要以毛主席讲的“五不怕”精神，死保林彪“接班人地位”。真是荒谬绝伦，造成恶劣的影响和很深的流毒。

4. 在我对林彪、林立果紧跟追随的恶劣影响和领导下，使宣传队变成了一支为林彪篡党夺权和吹捧林立果大造舆论的现场工具。宣传队虽是为了应付总局

文艺会演临时组成的一个单位，成立仅半年时间，却编排了不少为林彪、林立果歌功颂德的节目。在下基层的演出活动中，也不遗余力地为林彪一伙大造舆论。宣传队在我授意下，还搞了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活动；为林立果别有用心地给宣传队送人、送书、送录音机等感恩戴德的活动；向林立果写“效忠信”，紧跟追随的宣誓活动。我还打算参加总局文艺会演结束后，把宣传队继续办下去。办成培植“效忠”林彪一伙的“抗大”式的学校。

### **三、我参与林立果一伙搞的阴谋活动**

林立果在一九七零年九月末到广州住在白云机场以前，只是听到过一个林立果的情况的一些传说。我与他们并不认识，也没有直接接触过。我与林立果一伙的真正挂钩结合，是在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民航发生“616”分机事故后开始的。其进展过程，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中受到林立果及其死党周宇驰一伙的拉拢、吹捧的感染影响下，在我身上的潜移默化，一天一天的慢慢地与他们同流合污了。最后使我竟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

1.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我正在由于飞行事故思想上的压力，感到特别沉重处于无法摆脱的时候，林立果通过周宇驰给我说，林立果原来已经决定一、二日内即要回北京去，现在因广州民航出了事故，他为了与广州民航分担困难忧愁和表示关心宽慰之意，故决定推迟离开广州。我听了以后，顿时倍受感动，对林立果产生一种由衷的感激和敬意的心情。

2. 当“616”事故善后工作刚结束，林立果又通过周宇驰向我提出，要把广州民航作为他进行路线教育的一个试点单位，并要我报告刘锦平。我向总局报告以后，立即得到刘锦平的支持和赞同，认为这一工作是当时“突出政治”的重大任务。并派了总局政治部宣传部长董琦和秘书处长陈庆军来到广州与我一起，接受了林立果关于进行路线教育试点的指示。情不自禁地从内心感激林立果在广州民航摔了飞机后，正处在异常困境之中，他能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搞好路线教育着手给予帮助支持和关心。我误认为他抓工作能抓到点子上，和善于抓住工作的关键与要害，不由地在思想上对他产生了一种盲目敬仰的情绪。

3.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立果临离开广州回北京的前夕，他在白云机场初次公开露面，分别接见了管理局常委和局直部分干部。他对常委进行了庸俗的吹捧和赞扬，夸奖广州民航说：“党委领导团结，突出政治好，毛泽东思

想红旗举得高。”周宇驰也在旁边帮腔卖乖地插上说：“有人讲摔了飞机一切等于零，如果北京有人要拿这次事故刁难广州局的话，立果到时候会出面说话的。”林立果还甜言蜜语地把广州民航称为是他的“家”。还假惺惺地说，他以后还要经常来这个“家”的。我听了以后，当时感到很舒心的。他的一句话，不仅解除了我身上的沉重负担，还受到了他的包庇和袒护。自这次接见以后，不仅与他挂上了钩，且自然而然地向他靠近了。

4. 一九七一年二月，周宇驰到广州给我透露说，林立果回到北京后，考虑从工作需要出发，他已经向空军党委常委提出建议，要我当广州空军副政委兼广州民航局政委。很显然，这是他对我的拉拢。我听了以后，真实的心情，倒不是对这个挂名兼职有兴趣，我认为林立果是打着林彪“调查研究”的旗号来的。他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可能对我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和考核。他的这个建议，也代表了林彪对我的信任。我当时的态度是，一定要积极地、把自己所负担的广州做好来报答他们的期望。

5. 一九七一年六月，林立果在广州接见了广州民航所属各省（区）局大队的领导干部。这次接见中，他不仅再次庸俗吹捧和夸奖了广州民航，他还花言巧语地把广州民航又封为他的“根据地”。我听了他的这套鬼话后，不但不反感，反而心里感到一种美滋滋的味道。我当场就交代各省（区）局和大队的负责人，按照林立果的指示，一定要把工作搞好，绝不辜负林彪和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的关心和希望。

6. 一九七一年六月，林立果还接见了宣传队，观看了正在排练的《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节目，送给宣传队两部进口录音机。他在讲话中说：“宣传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舞台上跟南霸天斗，在台下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的敌人斗”的谬论。在我的授意下，宣传队当晚进行了讨论，向林立果写了“效忠信”。宣传队之所以搞得如此乌烟瘴气，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之严重，与我的领导是紧密联系的。我应负主要的罪责，是不容推卸抵赖的。

7. 一九七一年七月初，林立果临去空十二师前在机场宾馆接见了（李伟信在场）。他询问了广州民航听到有关上海的一些情况和对《文汇报》的反映。我听了以后，当时曾暗自沉思过，他能够把这样的问题讲给我，说明对我已不同于一般人看待。我对他的追随靠得更近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我做了整理，向常

委作了传达，并报告了刘锦平和总局政治部。“九·一三”事件后，把记录上交广州军区。

8. 一九七一年二月至七月期间，林立果的两个死党周宇驰和于新野到广州时，曾先后零星地给我散布过一些流言蜚语。谈及的问题中主要内容有：（1）胡说什么所谓党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两杆子（指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争权的斗争；（2）关于宪法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3）有关江青私生活的一些豪华、不正派和作风霸道的情况；（4）有关华北地区批陈整风会议的一些消息和吴法宪犯错误的情况；（5）林立果在汕头接见广州军区五十五军军长、政委谈话记录内容。我当时对他们透露的这些材料是听信了。认为他们谈的是有根据的。我也曾暗自推测过，他们竟然敢于把这些属于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央一些极端机密的情况泄露给我，可能是得到林立果点头的。不然他们是不会给我讲的。我之所以犯了如此严重的犯罪活动，与这些直接原因是分不开的。

四、经过九年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上述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个人应承担的罪责，是不容推卸和抵赖的。我诚恳向党表示悔过认罪，衷心接受党组织对我所犯的罪行事实进行严格审查，作出结论。我决心痛定思痛，痛改前非。党如果还能给我一条出路的话，我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一个遵纪守法的老百姓。■

【文 摘】

## 关于“战斗小分队”问题

米家农

这也是我的主要罪状之一。这个“战斗小分队”指的就是民航广州管理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说到宣传队，就不能不提到吕国贤。因为她是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宣传队是林立果的“战斗小分队”，主要负责人自然就是“特务头子”，我无产阶级政权焉能容忍“特务头子”逍遥法外？

吕国贤因此被抓了起来，和我一样受到牢狱之灾，先坐牢后流放广西劳改，前后八年。

这个“特务小分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回答：广州管理局为什么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吕国贤是谁，是怎么到宣传队的；吕国贤与宣传队的工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怎么成了林立果的“战斗小分队”？

上面的问题回答了，“特务小分队”问题也就明白了，吕国贤落难的原因也说明了。

### 广州民航局为什么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一九七零年冬，民航总局召开党委全会，总结当年工作与部署七一年（指一九七一年——编者注）工作。

会议决定：

为了更好地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全国民航系统将于一九七一年底在北京举行文艺汇演，要求六大区管理局各自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节目，待总局筹备工作完成后，等通知进京参加演出（民航总局党委会议记录保密室有存档）。

民航广州管理局的宣传队不是编制序列的正式单位，仅是一个为了应付总局文艺汇演，临时组成的文艺宣传组织。宣传队的领导干部与成员，都是从各单位和刚入伍的新兵中选拔出来的，共计八十余人（其他局也在100人左右）。

宣传队于1971年3月正式成立，“9.13”事件后的9月26日解散，时间仅为半年。管理局常委分工为副政委李心从、政治部副主任王曙勃负责。

### 吕国贤是谁，怎么到宣传队的

民航广州管理局党委常委会议根据总局党委决定组建宣传队干部人选时，副政委李心从提出调时任管理局劳资科长的吕国贤负责（任队长兼指导员）组建宣传队，常委会一致同意。

李心从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动议，常委会为什么会一致同意呢？

1. 吕国贤是我的妻子，我是管理局一把手，似乎更便于垂直管理；
2. 1963年吕国贤调民航，当时科（处）级干部任免权限属总局，在北京未

任免前，正逢总局要搞文艺汇演。当时管理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周玉清要吕负责搞业余演出队工作。她接受了这个任务，亲自主持排演节目，于1964年7月带队赴京调演，获得四个大奖。总局首长邝任农、刘锦平等领导还亲自接见了广州局的演出队。

由此常委们认为吕比较合适，一致推荐并作出决定（我不好反对）。

对于这次工作安排（负责宣传队）吕表示不愿意去。我把她的意见跟王斌和李心从谈了，他们说找不出合适人选，还是要吕搞。

我只有做吕的工作，说：“你是我老婆，我是书记，大家都愿意要你搞，我不好多说。你真不愿意，还是再找李副政委谈谈吧。”

吕又专门去找李心从，李对吕说：“找不出适当人选，搞还得你搞，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吕看推不掉，不干是不行了，向李提出：

1. 她只当指导员，负责组建选人与演出节目等一系列业务工作；要求另选一个干部当队长，负责整个行政领导事务工作。

2. 要求政治部明确一个领导专门负责管宣传队的工作，在大的问题上直接找李心从与副局长周玉清（江西红军长征老同志，常委分工主管行政、人事和后勤工作）解决。

李心从答应了吕提出的要求，找各个常委通气协商后抽调政治部秘书科长谢云当宣传队长；调运输业务处张迎（女）当副队长，协助吕搞节目编排。

局领导分工由政治部副主任王曙勃负责对宣传队工作的具体领导。

## 吕国贤与宣传队的工作

有吕国贤挂帅，宣传队决定成立了，可是人没人物没物，成立仍然是句空话，为了开展工作他们研究后决定先招人。

由于民航当时纳入部队序列，实行兵役制，人员都是应征入伍，于是吕国贤带队到长沙、上海、杭州各市选招文艺新兵。招了兵又亲自一件件选购乐器，在基本条件具备后，一九七一年三月初，宣传队基本组成（至“9.13”发生，存在仅半年时间）。

他们选定演出节目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因故事发生在海南岛，属广州局地区）。当吕国贤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很高兴，又担心一个业余宣传队

做不做得了那么大事呢，叫他们量力而行。吕国贤他们讨论后表示有信心有决心排练好，还说北京汇演要再拿一次奖。我当然很支持。

节目经报总局政治部同意确定下来。总局批下来压力就来了，因为那么大型的节目，一个宣传队没有经验，再者服装道具也成问题，因为民航没有钱。吕国贤联系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从他们那里聘请一个导演、两名专业演员指导。钱不多就省着用，比如芭蕾舞鞋几天就磨烂一双，吕国贤找了飞行大队中队长、正驾驶员他们没有工作的家属，成了宣传队非编制职工（放弃家务、不管吃饭），到鞋厂参观，找师傅学习，收集布料，带着自己的缝纫机，整天也与宣传队上下班在一起制作舞鞋，不花公家一分钱，高高兴兴地解决了舞鞋问题。

演出服是个大问题，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下，市场买布料要凭布票证，管理局又没法解决。吕国贤又动员了会做衣服的家属，带上缝纫机，想办法买一些不凭布票又廉价的布，还动员机关单位的女同志把她们不用的花布捐出来，支持《红剧》的演出。就这样自力更生，发动群众，解决困难，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把《红色娘子军》排出来在礼堂公演，广大干部职工群众非常高兴。“文革”结束后，礼堂舞台扩充的面积变成了管理局退休办公室了。

经半年时间排练即在礼堂预演，受到大家一致赞扬。跟随林立果的那些住在机场的人也看过排练，向林立果做了汇报。

一次排演后，林立果接见了宣传队全体队员并讲了话，为表示关心还送给宣传队毛主席规定学习的马列六本书。

《红色娘子军》作为业余宣传队演出算是可以，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请来指导的导演和专业演员认为，如果乐队部分能提升的话效果会更加好。这样大家的意见就集中在了乐器部分。

问题是，宣传队的小乐队由新招的懂点乐器的新战士组成，乐器也比较简单；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提升的话，就要购买一批西洋乐器，这笔开支就不好解决。常委下大决心花钱购买。外汇怎么办？操纵乐器的人呢？又是一个个新问题。因为外汇国家统一管理，广州局一分外汇也没有。就是解决了外汇，西洋乐器比较复杂，也不是几个小战士短时间能学会的。

怎么办？宣传队叫，管理局领导也为难……

任何一个文艺部门在当地都是个热闹的地方，林立果手下的人没事也喜欢到

宣传队转悠。就在大家找不到解决的出路陷入苦恼的时候，这件事被他们听到了，并把这事报告给了林立果。

据说当时林立果说：“这事好办，有什么好苦恼的”。他交代有关部门解决，有关部门花不菲的美金从香港进口了两台日本录音机。

录音机购买后，有关人员又专门到中央歌舞团，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了全套录音。当这两台录音机送到宣传队时，大家确实很感动。因为不仅音乐效果问题得到解决，而且小乐队的二十几个人也可以减免了，民航广州管理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一百二十几人减到九十几人。

不光宣传队人员，不光是我米家农，这件事我们常委可以说没有不感激林立果的，尤其是两个主管宣传队的领导李心从和周玉清。因为他不仅解决了我们根本没法解决的问题，还因此压缩了宣传队人员，减轻了管理局的负担。

由于录的是中央歌舞团全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效果比几个小战士奏的确实好很多。《红色娘子军》排练成功后，公演四场（本机场两场，佛山沙堤机场两场），好评一片。北京、上海来广州因故不能走的机组人员都看了演出，他们说，宣传队演出的和专业芭蕾舞剧团相比差不多了，可以到中山纪念堂去公演了。

民航广州管理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此名声传扬开来，以致总局政治部派专职摄影干事陈长芬（北京摄影界较有名气），专程来广州拍摄了一套《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照。

本来文艺团体就比较难管理，加上又是新入伍的孩子，没有经过纪律的约束。吕国贤一向是个工作有责任感的干部，为了对这批新战士负责，把这项工作完成好，她对队员除思想教育外，生活上管理很严，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和管理要求。生活上要求行动军事化，如平时着装整齐，进出食堂要排队，床铺要简洁整齐；严格请销假制度，平时外出要求集体相伴行动，不许单个随便外出；排练期间无特殊情况不能与亲友联系；因为是战士，严格禁止谈情说爱；对外要讲和气礼貌，讲究举动礼节。

总之她与队员同吃同住，真正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怎么成了林立果的“战斗小分队”

由于当时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并要求活学活用。

林立果学习毛主席著作后在空军作了一次讲用报告，空军藉此将其树为典型要求大家学习。空军这么一个大红大紫炙手可热的人物位居北京，下面的人只闻其名或听他的“讲用报告”，闻其声，难见其人。

宣传队员都是十几岁刚从全国各地新招来的义务兵，青年人本身就有崇拜英雄的心理特点。现在这位高高在上，下面的人想见见不到的“先进人物”来到广州白云机场，而且就生活在自己身边，宣传队员们的兴奋可想而知，觉得自己跟那么高的“先进人物”在一起很荣幸。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唱高调讲大话吹大牛成为社会时尚，上头喜欢个人迷信，全国都宣传个人迷信，“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成了文件、报纸、一切材料的开头语。尤其是林立果帮助宣传队解决了广州管理局都无法解决的音响问题，他们出于崇拜，出于感激，为了表示向“先进人物”林立果学习，在喊出“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某某“永远健康”后，自己加上一句“向林副部长学习”的话。由于林立果是军委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们在小节目中说自己听从林副部长指挥，要做世界革命的战斗小分队。

谁想，这些天真幼稚的举动惹下了大麻烦。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宣传队这些词句被上纲上线，性质就变了。特别是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华国锋在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不点名说某宣传队歌颂林家父子，随口说宣传队成了他们的“一支战斗小分队”。

在那个一切唯上的年代，大军区首长说是“战斗小分队”等于给宣传队定了调子，下面自然就跟着叫宣传队是“战斗小分队”了。

随着林彪事件的揭批查，上纲上线的调子越上越高，把队员们编唱的小歌小曲，挑选符合专案组要求的，就变成了宣传队的“队歌”；由于林立果关心宣传队的建设（确实解决了音响困难），宣传队为了表示感谢写了“感谢信”，信中有紧跟林副主席、向林副部长学习的句子，就成了“效忠信”。

### 因宣传队而落难的吕国贤

因为宣传队成了林立果的“战斗小分队”，宣传队负责人的吕国贤自然被列为林彪事件的重点审查对象。

宣传队成了“战斗小分队”，民航广州管理局党委常委决定成立的宣传队成了我“米家农个人的决定”。

好在也民航总局党委七零（指一九七零——编者注）年冬召开全会，要求各管理局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北京参加民航系统文艺汇演的决定记录（总局有存档），能替我佐证。

1971年“9·13”事件发生时，吕带宣传队正在湖南省局及十一飞行大队演出，突然关闭机场、停止一切飞行，宣传队回不了广州。

吕带宣传队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回广州不久就被关进监狱“隔离审查”了。

由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污蔑为“战斗小分队”，吕国贤是负责人，所以被广州军区隔离审查，关押在军区沙河监狱（唯一被关押的女性），成为一个广州地区所谓问题最大、最严重的女人。

……

根据吕检查交代和揭发的材料，专案组对她检查交代的的态度比较满意，将其错误性质定为流传、谩骂、污蔑、反对江青的反革命罪，报送北京。

后来吕被送往广西鹿寨农场监督劳动，时间长了，慢慢从监护她的女兵口中听到“四人帮”也准备把她定为反江青反革命罪，拟效法沈阳张志新式（封口割喉）处死。专案组将处置意见报送中央“林彪专案领导小组”负责人纪登奎处，纪看了吕的案件材料后批示：“吕国贤的问题不一般，暂不处理。”

广州军区藉此才没有处理这个女政治犯（不知也不敢轻易处理）。考虑不能长期关押，决定把她送到广西鹿寨农场监督劳动（但不同于王斌、技术五团政委等人）。由民航抽一组女兵（每期3至4人）和她一起生活，监督劳动。这些监护人都知道吕已定为死刑犯，所以在农场对她与对王斌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王斌可以自由活动，吕不能。

吕在七一年（指一九七一年——编者注）进学习班被隔离审查，与丈夫、儿女断音讯七年多，到一九七八年冬天，两个儿子去鹿寨农场探望，才与儿女联系上。

### 吕国贤不走绝路源自《空军报》的一条消息

……

（我出狱后妻子到长治来探望，下面的事是她告诉我的）

在七年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的日子里，吕国贤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折磨、刁难，她的委屈难以名状，她忍受的程度是一般女人做不到的。她已经失望，不，是绝望，因此她无数次想到“死”。可是，不能，她与丈夫有个说法：无论今后遇到什么样的波折，遭遇什么样的不幸，决不能走自绝的路，否则就对不住活着的人。如果丈夫死了，也真不想活了，因为活着遭侮辱受罪，不如干脆跟丈夫去了干净。现在丈夫死活尚不得知，自己怎么能走呢！

吕时时处处打听丈夫的消息，她利用一切与农场各级领导、监护人员、专案组接触的机会，千方百计探听米家农是否还活在世上的确切消息。得到的回答仍然跟不闻一样，谁也不会告诉她，因为谁也不知道。在广西鹿寨这么个小地方，他们也不可能知道。

一次她在厨房劳动，偶然发现一张破旧的《空军报》，报纸头版登着中央军委、空军党委决定逮捕“林彪死党”的名单，她的眼睛像雷达搜索目标一样搜索着丈夫的名字。如果说她紧张得拿报纸的手在颤抖，浑身血管里的血流加速流动的话，当她看到“米家农”三个字的时候，她的血突然停止了流动，开始她呆若木鸡，跟着一屁股摔倒在地上，眼泪流出来了，她嚎啕大哭起来……

丈夫还活着，丈夫还活着！不管他是关在监狱还是在什么地方，只要丈夫还活着，自己就不能死，就有团聚的一天，就要给他一个家。

吕国贤从此有了活下去的决心。

吕的案件来自民航广州管理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论怎么审查，这个宣传队都是纯洁的，是真真正正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从性质上，吕说与“9·13”根本挂不上边，后来关押、劳改，是她犯了谩骂、侮辱、反对江青的罪。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江青公审入监。按理，谩骂、污蔑、反对江青的吕国贤应该无罪释放，恢复名誉。不想吕的案子又从反对江青案，变成了宣传林彪案，和我一样成为“死党分子”。

不知为什么，专案组责其（指吕——编者注）把反对江青的检查交代底稿（材料、学习笔记），关押期间写的一百多首诗，全部当面焚毁。

一九七九年九月，专案组实在查不出吕的问题了，将其释放。■

【资料】

## 沈阳一中实现革命大联合庆祝大会革命师生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2月8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沈阳城内红烂漫，第一中学春满园。我们，无限忠于您的沈阳一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无比的喜悦，无限的激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我们战斗的喜讯：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春风，沈阳一中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沈阳市第一中学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了！

这是您的革命路线在沈阳一中的又一辉煌胜利！

这是您的光辉思想在沈阳一中的又一辉煌胜利！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光辉成果！

条条江河归大海，颗颗红心向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日日夜夜想念您！

山高高不过蓝天，河深深不过大海。敬爱的毛主席，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以五湖四海为笔，以蓝天苍穹为纸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在这春色满园人欢笑，高歌漫舞庆联合的日子里，我们尽情欢呼，尽情歌唱！我们有千万句知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千万支热情的歌要对您唱。千支歌，万支歌，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千句话，万句话，凝成一句话，我们衷心的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敬爱的毛主席，翻开沈阳一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哪一页不放射着您的伟大思想的光芒！回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走过的路程，那一步不是您的亲切教导和指引！

是您亲自批准播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激励我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写出了我校第一张革命大字报，

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在那战斗的日子里，为了保卫您，为了保卫以您为首的党中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不怕被打成“右派”，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又写出一张张的革命大字报，粉碎了赵谦城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扭转运动大方向的罪恶阴谋，狠揭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天空中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来阴风。正如您所教导的那样：敌人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为了镇压我校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派来了刘邓工作组。这个黑工作组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整群众的黑材料，把大批教师和学生打成“牛鬼蛇神”，“右派”，多少革命教师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多少造反派战士横遭围攻，监视！在那人妖颠倒，乌云笼罩的日子里，是您给了我们鼓舞和力量，是您的光辉思想照亮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洞察秋毫，明辨是非。

是您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召，制定了光辉的十六条，宣判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给我们撑了腰，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在您的战斗号令下，我们红卫兵小将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誓叫山河换新天！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红卫兵运动势不可挡。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又利用反动的地主阶级血统论，扭转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阶级阵线。一时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定律、法则和座右铭。“狗崽子”、“黑七类”满天飞，反动的血统论同宗派主义、实用主义相结合，在省市委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下，官办的红后代、沈字兵，把矛头指向了广大教师和学生，同窗共学的学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并肩战斗的同志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群众斗群众代替了斗、批、改，宗派小集团代替了党的阶级路线。在这斗争方向扭转，阶级兄弟相搏的时候，又是您给了我们方向和力量。我们怀着誓死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十六条”的决心，坚决抵制反动血统论，牢牢掌握运动大方向。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是您一次又一次地接见

我们红卫兵小将。当我们冲破伪筹委会、红后代、沈字兵的阻挠，来到北京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您站在敞篷汽车上向我们微笑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激动啊！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泪花在眼中萦绕，红心在胸中跳荡，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向您宣誓，坚决遵照您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令，下达了一个个文件，为我们撑腰。是您发表了一篇篇社论为我们指路。是您解放了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的同学和教师，是您解放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指引下，我们排除了重重阻力，成立了一个个造反组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动的地主阶级血统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受蒙蔽的群众觉醒了，反戈了。保守组织垮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了！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发动了一月夺权的风暴，在您的战斗号令下，我们进行了夺权斗争的演习！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她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在去年的二三月间，掀起了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走资派纠集起来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它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我校复课闹革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时乌云滚滚，妖风阵阵。辽河两岸，沈阳城内，到处是肃清无产阶级革命派流毒的狂吠，到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叫嚣！多少革命造反派横遭围攻，多少革命造反派被迫请罪！多少革命造反派被抓一小撮！多少革命造反派被投入了监狱！革命有罪了，造反有罪了，历史颠倒了！

在这乌云压城，毒流横溢，黑白颠倒的日子里，我们捧着您的红色宝书，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您的教导：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我们眼望着北京城，心想着你老人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敬爱的毛主席呀，想起您，我们心红眼亮骨头硬，想起您，我们志高胆大方向明，想起您，千难万险无阻挡，想起您，乱云飞渡仍从容！

平地一声春雷，北京城又发出了您老人家的声音，“四·二”社论发表了，117号文件下达了！您又一次解放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重整旗鼓，杀向社会，投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决战的疆场。我们同辽沈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横刀跃马，狠砸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揪出了马、顾、喻、黄等走资派，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英姿飒爽，成绩辉煌。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图穷匕首现，为了苟延残喘，在八九月挑起大规模武斗，企图用武斗镇压造反派。一时阴风怒吼，浊浪排空。机关枪代替了大民主，手榴弹代替了大辩论。多少革命造反派组织横遭洗劫，多少红卫兵小将忍痛离开了学校，多少坚强的战士倒在阶级敌人的枪弹下……可是，为了捍卫您，为了捍卫您的革命路线，为了祖国江山永不改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死而无惧！在阶级敌人的枪弹下，我们没有停止过宣传您的光辉思想，宣传您的革命路线。面对白色恐怖，我们没有气馁，没有屈服。我们牢记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您老人家亲！是您亲自派出了中央调查组，支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您发出了一系列最新指示，号召我们实现革命大联合。是您发出了中发[68]13、14、15、16文件，给我们送来了浩荡的春风。

今天，我们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迎着劲吹的春风，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二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地认识了一个伟大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永远跟着您，永远紧跟你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幸福，就是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经过两年来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锤炼，我们的心更红了，我们的胆更壮了！我们决心一辈子跟您干革命，永远跟您在大风大浪里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决心遵照您的教导，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光辉思想是革命的灯塔，是胜利的保证。我们要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您的光辉思想，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面落实您的最

新指示，深刻领会您的光辉思想。要高高举起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让一中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把一中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我们要遵照您的指示，“斗私批修”，总结二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大讲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大讲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狠斗私字，大立公字，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您的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做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打倒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肃清地主阶级血统论的流毒，积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大力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胜利完成斗、批、改。

我们要遵照您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教导，继续高举拥军的大旗，坚决相信、依靠、拥护、热爱、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情帮助沈阳驻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我们要遵照您的指示，实现“复课闹革命”，坚决进行教育改革，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的新教育，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中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敬爱的毛主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无限自豪，满怀胜利的信心。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你宣誓，我们要一辈子读你的书，一辈子听你的话，一辈子照你的指示办事。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你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你的光辉思想，永远跟着您寸步不离，风吹浪打心不变，海枯石烂志不移。我们要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您的统帅下，惩腐恶，缚鲲鹏，换新天，起宏图，横扫一切害人虫。誓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球！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以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祝愿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沈阳市第一中学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

【资料】

## 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暨党中央的致敬电

1968年3月3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我们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春风已度玉门关，千里陇原红烂漫；红旗如海歌如潮，徽县山河尽欢颜。今天，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统帅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光辉指引下，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直接指导关怀下，沐浴着阳春三月的灿烂阳光，迎着浩荡东风，伴随着东方红的响亮乐曲，崭新的红色政权——徽县革命委员会庄严宣告光荣诞生了！胜利成立了！！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徽县革命造反派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重大胜利！是徽县十五万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喜事！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在这万分庄严隆重、无限激动喜悦的时刻，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意气奋发，斗志昂扬；我们喜泪盈眶，心向北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老人家唱，有无限衷心的话语要对您老人家讲，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汇成时代的最强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看今朝，东风劲吹，红旗如海，凯歌高奏；忆往昔，峥嵘岁月，征程艰险，战斗方酣。徽县地处甘肃东南，素有“陇上江南”之称，这里是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加油站”，又是陇南地下党的发源地。徽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我们为此而光荣，为此而骄傲。解放十八年来，徽县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然而，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秋毫所警示的那样：“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是睡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徽县的代理人——×××、×××（编者删，下同）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把持党政财文大权，秉承黑主子的旨意，与党中央分庭抗礼，倒行逆施，大搞修正主义，妄图把徽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试验田”，是可忍，孰不可忍？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候，是您老人家纵观世界风云，洞察中国革命实际，以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的大无畏气魄和胆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军的号令。徽县以革命小将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您的战略部署，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奋起战斗，矛头直指以××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可是，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阻挠压制，他们企图把刚刚兴起的革命风暴扼杀于摇篮之中，执行黑主子的路线，派工作组，划框框，定调子，限制“四大”，压制群众运动，转移斗争大方向，制造“七十二天白色恐怖”，迫害广大革命教师。在革命派受到压制、镇压的时刻，是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千钧霹雳，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盖子，敲响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徽县革命派以“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行动，一举夺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权，罢了他们的官。然而，他们并不甘心被打下政治舞台，企图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较量，暗中操纵其御用工具——“县红联”保守组织，假造反，真保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导演了骇人听闻的“八·八惨案”，进而实行反动的“农村包围城市”，欲置革命造反派于死地而后快。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在那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日日夜夜，我们革命派战士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我们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明天”。我们坚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就在这正义与逆流、生与死、血与火大决战的危急时刻，是您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驻天水四军，最忠实地执行您老人家“三支两军”的指示，坚定地支持徽县革命造反派，发表了《关于徽县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座谈纪要》，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志，重挫了“红联”保守派的组织体系，为我

们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胸怀大，河深海深不如您对革命造反派的恩情深。罄南山之竹作笔，倾嘉陵江之水当墨，以徽县大地为纸，也写不尽造反派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敬、无限拥护、无限忠诚。

“人生能有几回搏，战地黄花分外香。”徽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您的光辉路线指引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顶逆风，战恶浪，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迎来了崭新的红色政权的诞生。“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喜看今日徽县大地，阳光灿烂，阴霾尽扫，红旗漫卷，山河欢颜；革命造反派扬眉吐气，英姿焕发，放声高歌，激情昂扬！

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徽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将启开新的一页，标志着我们的战斗任务将转入红色政权建设的新阶段。在这重大胜利的日子，在这庄严隆重的时刻，徽县十五万忠于您的革命儿女向您宣誓，向您保证：

一、我们一定要遵照林副主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重要指示，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您的光辉思想铸造我们的灵魂，武装我们的头脑，指挥我们的行动。誓当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卫士。

二、我们一定要遵照您老人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指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乘胜前进，再接再厉，认真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的各项工作，深入揭批××一小撮走资派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气候和土壤。

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革命政权的坚强后盾。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革命造反派，更加体会到拥军的重要意义。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始终不渝地做好拥军支军工作，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

四、“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心脏一样爱护新生的红色政权，维护她的绝对权威，捍卫她的崇高尊严，

服从她的正确领导，关心她的茁壮成长，把她建设成为领导徽县十五万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司令部、指挥部。我们要乘大好东风，抓好社队一级的红色政权建设，早日实现徽县山河一片红。

五、我们一定要遵照您老人家“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教导，搞好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搞好以斗批改为中心的各项革命工作，搞好“复课闹革命”，搞好拥军和战备工作，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深知，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坚信在您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在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的前途一派光明，我们将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

选自《徽县文史资料》第二十五期

【资料】

## 长丰县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5月1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今天，无限忠于您的五十二万长丰革命人民，从淮南路东，到瓦埠湖畔，手捧红彤彤的宝书，仰望金灿灿的北京城，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长丰县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光荣诞生了！我们最最热烈地欢呼您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最最热烈欢呼您革命路线谱成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喜庆空前的日子里，经过两年来文化大革命浴血奋战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多少贴心的话啊要对您讲！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千百万人民从心坎里迸发出时代最强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我们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最底层，横贯长丰的淮南铁路，竟成了他们敲骨吸髓的毒蛇。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啊，我们贫下中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无遮身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多少人背井离乡，多少人妻离子散！斑斑血泪，“洒向人间都是怨”。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黑手高悬霸主鞭”。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点燃的井冈山星火，照亮了长丰县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在铁路两侧，在田野村庄，到处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烽火。驱日寇，打老蒋，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忙”。

中国向何处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沿着您指引的康庄道，

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红色巨浪！口吃甘蔗节节甜，脚踏天梯步步高，人民公社是金桥，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定了！

“农业学大寨”这是您发出的伟大号召，我们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穷二白要革命，战天斗地有方向；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开山劈岭引来史潞淮河水，稻麦千重浪，棉田一片白茫茫。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正当世界一日千里地进入到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安徽和合肥地区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狗胆包天，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倒转时代的车轮。螳臂岂能当车，乌鸦怎能遮住太阳！就在这历史转折的紧急关头，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惊人胆略和气魄，亲自点燃和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丰地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你的“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的鼓舞下，奋起了您的思想千钧棒，向党一小撮走资派发起了猛攻。

“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决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打击一小片，保一小撮，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您是黑夜的北斗星，雾海的灯塔。是您，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勇气、无尽的力量。是您，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是您，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亲自批发了《九条》、《五条》、《九·五》指示和《九·二三》通知，为我们驱散了迷雾，拨正了航向；是您亲自派来了人民解放军，立场最坚定，旗帜最鲜明，“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同我们风雨同舟心连心，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踏遍世界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没有您的阳光普照！回顾战斗的历程，哪一个胜利不是您光辉思想的结晶！您的书是革命的宝，您的思想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热情宣传您的光辉思想，誓死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把活学活用您的著作放在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用您的思想，统一全县革命人民的思想。破私立公，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使您的光辉思想转化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大办、特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您的思想，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打倒资产阶级派性，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紧跟再紧跟！您的最新指示，我们一定落实再落实。千斤重担我们挑，万里征途我们走，刀山我们上，火海我们闯，永远跟着您，直奔共产主义前方！

毛主席啊，毛主席！喜看今日长丰大地，是您的光辉思想的天下，艳阳当空照，红旗舞东风，天红、地红人更红，世界一片红彤彤！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蘸尽江河湖海水，写尽大地蓝天云，也倾吐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我们永远高歌东方红，永远欢呼万岁！万岁！毛泽东！ ■

长丰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1968年5月1日

## 【读者来信】

## 1. 沈迈克：“反革命社会基础”是谁发明的？

我在思考和研究“前三十年”的历史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其性质很简单，不过是“某个提法的发明权归谁”这一类的。今天给贵刊编辑室写信，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通过你们找到答案。

从我所掌握的文献中看来，新中国建国初期曾经有个常见的政治术语叫做“反革命社会基础”（当年简称“反基”）。1953年，罗瑞卿在第二次民警治安工作会议上对“反基”做了一番权威性的解释，列出了它所包含的种种“分子”，并且号称这些“分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属的存在“可供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在同一篇讲话里头，罗还说“国内也还有不少可供反革命滋生发展的社会基础”（见《公安建设》第77期）。

到1954年，中央公安部出了一篇《认真进行对反革命社会基础的调查研究工作》的文章，重复了罗部长的解释，并且还加上了这样的一段文字：“这些各色各样的分子，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已经作案、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或者是可能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对象。总之，应该看到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危害着社会治安，必须严密控制这些分子的活动”（见《公安手册》第23期）。

到了1955年3月份，中央公安部党组《关于目前农村治安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我们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进行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残余反革命并未被完全消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中，残余反革命分子还有一个相当的数量。当着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期，那些已经被消灭和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中，还正在不断滋长着新的反革命分子。这些敌人，在他们没有被消灭干净之前，总是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见《公安建设》第124期）。而在1956年4月份，恰好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同一天（4月5日），在一篇对“敌人社会基础”作权威性解释的“答读者问”中，公安部的《人民公安》编委会在那些来自罗瑞卿的“一般指的已经被消灭的……”文字后面另外加了这样的一句：这个社会基础“不仅是容易被敌人利用的对象，而且在他们中间，时时刻刻有可能滋生新的

反革命分子”（见《人民公安》1956年第4期）。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办公厅1959年1月份发出的《关于反革命社会基础的统计界限的说明》就是这么开始的：“反革命社会基础是指能够滋生反革命分子和可资反革命利用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阶级残余和社会阶层……”（见《公安建设》1959年第3期）。

当年，关于“反基”的统计数字之具体详细，半个世纪以后看了让人哭笑不得。比如说公安部在一篇专报中称，1959年9月“全国（应为“台湾省除外”——迈克注）共有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社会基础二千二百七十六万七千九百零四名……”（见《公安工作简报》1959年第80期）。不过与此同时，各地有关部门存在着对所谓“标准的统一”的很不一样的认识，例如“绝大多数地区称新的反革命为新生或新滋生的反革命；北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新生反革命，因而称新的反革命为自发反革命”（见《公安工作简报》1960年第9期）。到了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各地“深入开展敌情调查研究工作”的时候，原来的“社会基础”一词还常常改写成“阶级基础”，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先不谈了。

我现在所想知道的是，到底是谁发明了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革命社会基础”有（或“不断地”或“时时刻刻地”）“滋生”反革命分子的功能的提法呢？是罗呢，还是比他地位更高的某思想家？

2015年7月22日

## 2. 徐光胜谈“帮派史学”

王海光教授在《答客问》一文中，提出了“帮派史学”这一概念。凡是对当代国史的研究现状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最大的“帮派史学”在哪里。王教授身在其中，却把矛头指向海外的林彪研究者。让人想起了曹植的七步诗，想起了文革时人们常说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盼将此信原文登载。

2015年8月12日

## 版权声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